

记忆 122 期
2014 年 11 月 30 日

目 录

【流年碎影】

〔瑞典〕拉斯伍拉·伯格利 文/克奴特·维特贝 图/沈迈克 译

1967年春天的北京——瑞典人的记录

【考 证】

余汝信 北京西兴盛胡同七号——有关钱壮飞后人的一些故事和疑问

【卞案研究】

华新民 “卞仲耘命案”争论拾遗——对刘进、宋彬彬解释的质疑

刘 进 我为什么要退出女附中的文革筹委会——简复华新民先生

宋彬彬 “八一八”之后，我的选择——答华新民先生

【答 疑】

马昌海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下编）所遗漏的历史事件

【口 述】

袁庚华口述 李素立采写并整理 郑州文革武斗和“文攻武卫”口号（三）
——原河南二七公社“火指”负责人袁庚华专访

【述 往】

朱 特 插队的那些事（五）——第一次回家

安希孟 安希孟回忆录（四）——我的大学

【简讯】

阿 陀 香港中大召开“编写《广州文革史》座谈会”

【资 料】

关于右派分子戴煌的材料——1962年戴煌的十万言书（三）

【读者来信】

1. 赵超谈郑仲兵访谈
2. 顾训中纠错
3. 120期的其它误植
4. 胡宗式、章铎谈郑仲兵访谈
5. 陆水林谈郑仲兵访谈
6. 张晓良为121期纠错
7. 杨耀健谈红卫兵
8. 小庄谈唐燕之作
9. 涧之溪、秋山枫叶、东方倦客等谈121期教育专辑的刊头设计

【版权声明】

【流年碎影】

1967年春天的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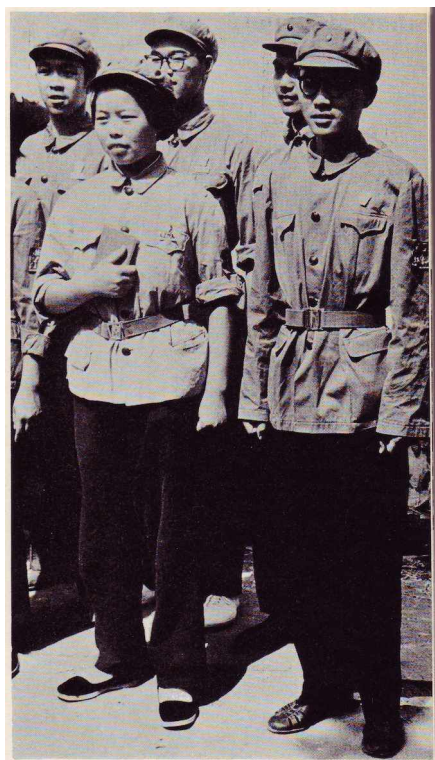
——瑞典人的记录

〔瑞典〕拉斯伍拉·伯格利 文 克奴特·维特贝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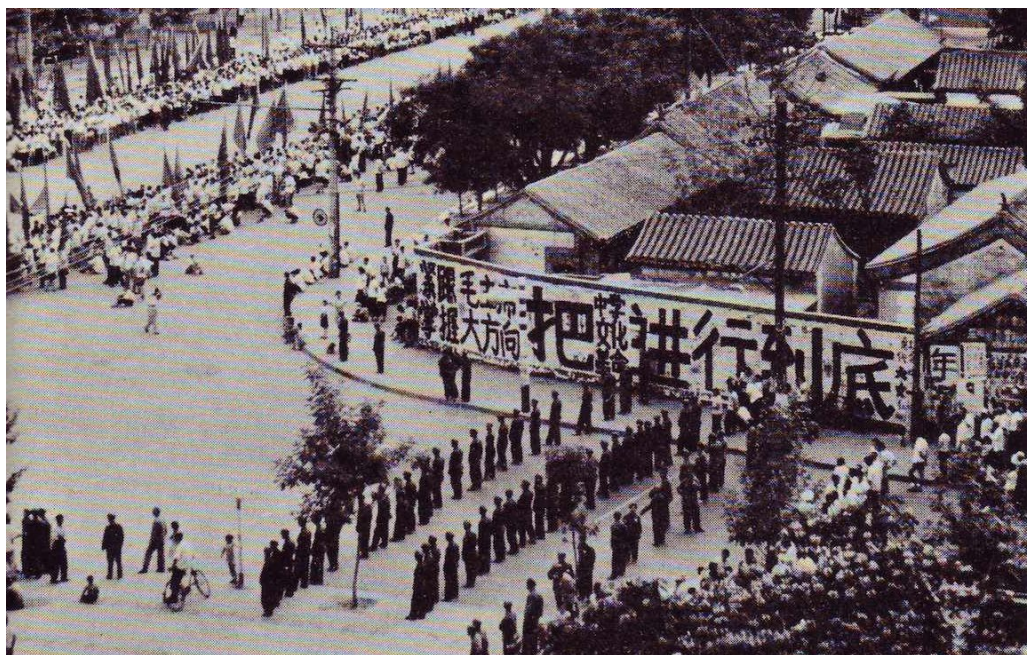
沈迈克 译

隆德大学的学生会会刊《隆苑》（Lundagard）创刊于1920年，是全瑞典此类刊物当中历史最长、名气最大的，该刊历任主编的“学生领袖”有不少毕业后又成为社会“名流”或政界要人。1967年至1968年时任《隆苑》主编的拉斯伍拉·伯格利（Lars-Ola Borglid）先生，曾于1967年五六月份以隆德外交学会观光团成员的身份应邀访问了中国，去了北京、广州、杭州、上海、无锡、南京等地方，回瑞典以后写下了他在中国所见所闻，出了一本名叫《毛的中国一瞥》的小册子（Bilderna från Maos Kina），当年颇有影响。跟着伯氏一同去中国的有隆德大学摄影爱好者协会主席克奴特·维特贝（Knut Witberg），他为《一瞥》照了一组插图黑白照片。其中较有价值的几张，都是在北京摄的，书里另外还有约四十张摄于外地农村、历史意义不大的。









伯氏写的《毛的中国一瞥》是一部比较典型的毛时代的采访文献，下面是我从中翻译成中文的几段文字，供《记忆》读者欣赏。

有一天，我们参观了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让我们对这次访问特别感兴趣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是因为一年前，文化革命真正爆发前夕，另外一个瑞典考查团（study group）（即瑞典“克拉尔特”代表团，新华社《参考消息》曾经于1966年9月16日以“瑞典朋友访华后说：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好得很”为标题发表过关于该团的消息——沈迈克注）也采访了这个工厂，那么我们可以拿他们和我们的印象去做比较。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媒体一直把第二通用机械厂说成是一个榜样，大家都可以向它学习在进行了一次文化革命之后，要如何搞好生产。

忠于毛的工人于1967年2月19日夺了机械厂的权。夺权以前，这些革命造反派（即工厂里等于教育界中的红卫兵的人们）先进行了七个多月的激烈的斗争，才当上了领导。我从别的材料中了解到，那次斗争中有牺牲了的。原来1966年，第一个瑞典团来的时候，有两个厂长出面，而今天欢迎我们来参观的人们当中，只剩下其中一个厂长。现在的领导班子是一个有造反派和四个干部（负责人），后者包括一个党委书记和一个副厂长。

在我们的采访中，他们毫无保留地承认阶级斗争原来非常激烈，特别是在

文化革命初期的时候，而一直到今年二月份，“阶级敌人”还在企图不让群众在政治和经济两个领域里夺到领导权。

不过在文化革命的过程当中，他们创造了一种由干、工、兵三种人的合作方式，即所谓革命的三结合。夺权时，工厂里原来有三个不同的群众组织，但这些组织现在已经合并成一个。

如今工业领域里的政治工作，起着核心作用的就是这些群众组织。它在不同的工厂里的具体工作有不同：我听他们说到一个现有职工 500 多，群众组织 43 个的工厂。在我们也访问了的北京第二棉纺织厂有两个大的群众组织，以及不止一百个小的。当我们提问说是否影响协调生产方面的工作，他们说不影响。所有的群众组织只有一个目的，而且是一个共同的目标，那是实现毛的理想。

我问他们说你们这种组织上的分裂，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没有必要的了？他们不承认，反而说因为工人们当中有些不完全一致的看法，在每一个单位里不可能没有一定数量的不同的组织。

【考证】

北京西兴盛胡同七号

——有关钱壮飞后人的一些故事和疑问

余汝信

这一小撮有关西兴盛胡同七号的材料，本世纪初，淘自潘家园。

在北京大规模城市改造带动的拆迁潮中，老旧的西兴盛胡同七号，早已荡然无存。惟在上世纪中叶，在这一个普通的院子里，居住着一位名叫钱叶丽（又名宁叶丽）的普通家庭妇女，她的身世，却与钱壮飞——一位据说是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命运的传奇人物，有着一些关联。

一、涉及西兴盛胡同七号的一些信函、报告及批示

以下信函、报告及批示，按时序编列。

（一）宁念慈致罗青长函及罗青长批示（1979年6月9日、12日，抄件）

敬爱的罗伯伯：您好！

我是钱壮飞烈士的外孙女。我妈妈是外公的大女儿，钱江同志的大姐。我叫宁念慈，今年卅五岁，在北京六〇八厂任技术员。

今天，在这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写信给您恳望您帮助我们家甄别政治上的不幸遭遇。

这是我们第二次惊动党组织。第一次是一九六三年，我妈妈患子宫颈癌，当时我还在上大学，急得没有办法，多亏我大舅妈（施平同志）（注：应为史平，下同。）帮我们找了您，您委派修同志把我妈送进了日坛医院，经过放雷[镭]治疗，得以治愈，这是党给了我妈第二次生命，也使我们全家得以复生。

我妈妈——一个烈士子女，教授家属，长期从事街道工作……文化大革命初，作为出身为资本家，本人成份也是资本家被揪出实行专政，挖地三尺地抄了家，癌症初愈的老人，强迫劳动，横遭体罚，从

自住的独院六间被赶到二间车[居]屋……。

这一切无非是林彪“四人帮”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一场浩劫中的沧海一粟吧。想多少出生入死的老红军、老干部所受的迫害，岂不更甚。而不能理解的是，“四人帮”粉碎已有两年多了，党的政策却迟迟不能在我妈身上落实，明明当时是街道委员会提供的材料，现在却说成是群众运动而不予甄别，甚至连烈属都不承认，我大舅（钱江同志）专门为此，由北影党委开了证明信，但也无济于事。二龙路办事处至今还写的是资本家、房产主。

我爸爸是同盟会员，历任北京大学教授，我的继父是北京农业大学体育教研室主任，从来都没有经商。只是在我父亲一九四六去世后，家里迫于生活，将一些住房出租。至四七年和继父一起生活后，主要以继父的工资为生活，一直到现在。根据党的划分阶段的政策，怎么也不能定为资本家或房产主。

由于党的政策不能落实，严重的影响着我们全家的政治生活和我们兄弟姐妹的政治上的进步。至今一部分抄家物资不予归还，最为可惜的是我父亲留下的遗著和二千多册芷[字]画下落不明。直接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是居住的房间，又少，又狭窄，困难很大。

我妈今年已经是六十六岁高令[龄]的老人了，又是癌症愈后（至今每年都须随访），文化大革命以来，又先后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及胃病，加上政治上的遭遇，我们做子女的深为母亲的心绪与健康担心！

老母亲这一辈子真可谓饱经风霜，还在十四岁时，由于革命形势需要，被迫与生身父母分离而寄人篱下，三十三岁守寡，留下四个幼儿。解放后生活刚能安定，五十岁时又得了癌症，文化大革命又遭此不白之冤……。

最了解我妈妈的是我外婆，外婆总说妈妈可怜，所以解放后来北京，愿意和我们同住。当时党组织培养烈士遗孤，送妈进培训班，安排到区、市妇联工作。为了照顾我外婆，她放弃了妇联工作，一直坚持在街道和幼儿园工作，直到患了癌症，妈妈一直因为自己是一个家庭妇女不被人们关切而抱憾。当时街道斗我妈妈的一个简[间]接原因

是，那个时候，我们家的亲戚，大舅、大舅妈、二舅（钱一平）、三姨（黎莉莉）、三姨夫（罗静予）没有一个不被揪出来的，当时街道就公开说，我们是一个黑帮家庭，而如今都得以平反、昭雪，唯独我妈和我们家，还处在冤屈的深渊中！

敬爱的罗伯伯，我们都知道您很忙，要操理党和国家的大事，相比之下，我们的家的小事不应该惊动您。去年三姨夫罗静予同志骨灰安放仪式那天，我想找您谈，我听了大家的意见，还是等一等。时隔一年多，仍不见动静。每次回家，看到可怜的妈妈，实在无法抑制激动的心情，鼓气[起]勇气，给您写信，恳求您关心我妈妈和我们全家的政治命运！

同时，烦请转交我妈妈给邓付委员长的信。

顺致

敬礼

宁念慈 谨上

1979年6月9日

家母地址：北京西城区西兴盛胡同七号（所在二龙路办事处）

政治部：此事请林岩同志找施平、钱江同志了解一下，协助予以关注解决。邓大姐身体不好，钱信暂不上送，结果望告。

罗青长 12/6 79.

注：宁念慈，钱叶丽的小女儿。罗青长，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

（二）中央调查部政治部致北京市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函（1979年6月25日，抄件）

北京市委落实政策办公室：

近我部罗青长同志接到烈士钱壮飞同志的外孙女来信，并附来钱壮飞同志的女儿叶丽同志托青长同志转邓颖超同志的一封信，基本内

容是要求落实政策问题。我们按青长同志的批示，派人去找过钱壮飞同志的儿子钱江同志（现在北影工作）谈了些情况。我们认为她们的要求是合理的，特转请予以关心，作为烈士家属对待。根据党的政策，对其所提问题尽快予以落实解决。

现将宁念慈给罗青长同志的信，钱叶丽（或叫宁叶丽）给邓颖超同志的信（我们复制件）及我部林岩同志与钱江、史平二同志谈话要点一并转去请阅。

另为帮助了解和处理问题，将我部所了解的有关钱叶丽的家庭情况介绍给你们，供参考。

钱叶丽的父亲钱壮飞同志，1895年生，浙江湖州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至白区做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对党有特殊贡献。后撤到苏区，1935年长征时牺牲。烈属证现存北京电影制片厂钱江同志处。

叶丽的前夫宁协万，是大学教授，曾帮助掩护过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并在经济上支援过党的组织。日本占领时期，自己著书，不为日寇教书，是一位爱国的高级知识分子。

叶丽现在的爱人宣昌同志是农业大学教授。

如还需要了解什么情况，请与我部干部林岩同志联系。电话：（略）

中央调查部政治部

一九七九年六月廿五日

（三）邓颖超对钱叶丽函的批示（1980年2月21日，抄件）

钱壮飞之长女钱叶丽。请北京市妇联徐光同志，与市落实办公室及西城区有关部门，应继续予以落实政策为是。

邓颖超

1980，2，21，

（四）北京市西城区房屋落实政策办公室关于申请解决钱叶丽住房问

题的报告（1980年4月2日，原件）

市房屋落实政策办公室：

钱叶丽系烈士钱壮飞同志的长女。钱壮飞同志一九二六年入党，长期在白区做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对党有特殊贡献。一九三五年长征时牺牲。烈属证现存钱叶丽之弟钱江同志处（钱江同志系北京电影制片厂付厂长、导演）。钱叶丽前夫宁协万（已故），系北大名教授，曾帮助掩护过我党地下工作人员，是爱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后夫宣昌现为农业大学教授。

文化大革命前，钱叶丽在西兴盛胡同七号有自住房十三间，系独立院。文化大革命初期，钱被批斗、抄家，并被强令迁至前院的两间西房，约二十五平米。目前，钱家三口人，钱夫妻二人住一间，男孩二十七岁住一间，她与前夫生的四个孩子，经常回来探望，无地居住。在文化大革命中，该院经过拆建，只保留了原来的四间北房，其它房拆建后划归别院，另行安排了住户。

去年，钱叶丽与其女宁念慈，分别给邓颖超同志和罗青长同志写信，要求落实政策。中央调查部为此事给市委来函联系。市委要求给其尽速落实政策。关于政治上平反，退赔查抄物资等问题，我区有关部门正在抓紧进行工作。关于住房问题，钱叶丽一方面表示理解当前群众的住房紧张状况，只希望收回四间北房，连同她现住的两间西房，有这六间房也就“凑合”了。另一方面，她也强烈表示：“一定要在死前住上自己的房子”。目前，这四间北屋住着两户居民，一户三口人住两间，一户五口人住两间，均有大儿大女。由于钱叶丽系我党有特殊贡献的烈士子女，又系高级知识分子家属，确需给其落实房屋政策，我们恳请市房落办拨给房屋五间，将上述两户居民迁出，把四间北房还给她。

附：中央调查部给市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函（抄件），及宁念慈（钱叶丽女儿）给罗青长同志的信（抄件）

西城区房屋落实政策办公室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日

（五）钱叶丽致西城区区长封明为函（1982年3月15日，原件）

封区长：您好！

我是您管界的一名老百姓，今年七十岁了。文革时期被不明不白地抄了家，没收了房子，后来由于邓颖超同志的批示转至北京市后转西城区委，才于八〇年六月份给我政治上平了反，八〇年底落实了两间房屋。去年十月因为我丈夫宁协万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活动中，政协给我家发出了三份请帖，使得我长期在美国定居的儿子及儿媳回祖国赴会并与亲人团聚了。在此之前，我曾经代[带]着老儿子找过您，您表示，对我家的事情较为熟悉，当即同意给落办老李打电话，争取让我们年底落实最后的一间房，即西城分局程玉军住我们的那间房。我们等啊，等啊，至今毫无音信。您是一区之长，是人民的父母官，说话是应当算数的。我家十三间自住房都被房管所在十年浩劫中拆得破破烂烂，如今只剩下这三间房，（前年回来两间）目前只需要再解决一间，这要求不能说不合理吧！

我儿子、儿媳在离开祖国返美之前，跟政协付主席甘祠森先生谈及过此事，甘先生表示，我们给政协主席邓小平先生写信，他可以转至上去。为了我家的事，邓付委员长已经作过批示，难道还要再麻烦邓付主席吗！

封区长，信写到此处，我是十分激动的。我一个烈士的女儿，父亲钱壮飞烈士在长征中牺牲，丈夫宁协万先生在旧民主革命中又是老前辈，而他们的家属与后代向政府部门要回自己一点点应享受的权利却是这样的难，可以说磨破了嘴皮，跑断了腿，阻力究竟在哪里呢？！

如今我老儿子，已经三十岁了，还未结婚。我四儿，一女，十三个孙子孙女，居住十分拥挤。希区委做好工作快快还给我们房子吧！

顺祝

春安

西城西兴盛胡同七号

钱叶丽

82.3.15

（六）钱叶丽致北京市市长焦若愚函（1982年8月7日，原件）

焦市长：您好！

我是长征烈士钱壮飞同志的长女，名叫钱叶丽，住在西城西兴盛胡同七号，今年快七十岁了，五十多年前（即一九二五年）我与辛亥革命的发行人之一——宁协万教授结婚，改名为宁叶丽至今。

文革时期，我因为无辜被迫害几乎丧命，家庭全部破产，子女深受株连，丈夫所留的全部著作、字画、书籍被抄走，房子也被没收。七九年邓颖超同志从我弟弟钱江处得知我深受其害，便给我作主，最后由西城区委出面以二龙路办事处的名义给我平了反（附上平反证明一份）。并还给我两间自住房。

宁协万先生一九〇五年参加同盟会，一九一一年参加辛亥革命，在孙中山政府任葡萄牙公使，后来出使西方六国考察，先后到了俄、英、法、德、意、美。所著书“西征纪事”、“留英政治谭”曾一度脍炙人口，誉满中外，是西学的名著（见照片）。后来因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宁协万先生便弃政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聘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三十余年直至去世。去年我国政府举行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大会，我及我的在美国定居的儿子宁巴黎先生、儿媳铃木纪子女士应邀出席了大会（见报参加大会各界人士名单）。当您在人大宴会宴请全体代表时，我的儿子，儿媳均与您同桌。不知，您能否还记得。

我的父亲为人民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的丈夫也是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多年，我本人也多年受党的教育，从事了多年的街道工作，因此对于国家面临的各种波折和困难是很体谅的。因此我虽然在十年浩劫中多次受皮肉之苦，精神摧残，倾家荡产的迫害，都坚定地挺过

来了。但是如今我一个年近七十老人，有四儿一女，七八个孙子孙女，住房十分拥挤。我们要求政府有关单位能真正按党的政策退回我们自己的私产。我有十三间房子，二龙路房管所拆除了九间，如今还保留一间北房，落实政策时只还给我两间，另外两间一直被西城分局干部程玉军和房管局干部董克敏占据。这些情况您的助理封伟明[封明为]同志（原西城区区长）都清礎[楚]，还许诺过我去年年底一定给我解决。如今八个月又过去了，我十分着急，只好请您一市之长做我作主。

另：邓大姐对我的批示保存在西城区委李克晨手中

您市一百姓

宁叶丽

82.8.7

二、钱壮飞的后人们，故事和疑问

虽经高层人士邓颖超、罗青长具体批示，钱叶丽要回自己房子的申诉请求，历经三年多的时间，仍未得以圆满解决。1982年8月以后解决的进展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说实话，笔者对西兴盛胡同七号最后的处理结局没有什么兴趣，只是这一小撮材料，勾起我们对钱叶丽本人，以及其弟妹们一些实情的追问——因为有关钱壮飞后人的基本信息，在现有的公开著述中，大多是相互矛盾、含混不清的。

（一）钱壮飞一共有几个儿女？

随着过去一段时间谍战片的风行，曾经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潜伏并为中共立下殊功的钱壮飞，成为媒体舆论十分关注的一位历史人物。2009年，由中央十一个部委联合组织开展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人物”评选活动投票结果，钱壮飞列为百人之一。吉林出版集团为此出版一套百人丛书，其中自然就有《钱壮飞》。该书称，“钱壮飞牺牲后，留下钱椒、钱蓁蓁、钱江、钱一平四个儿女。”（褚当阳、刘爽编著：《钱壮飞》，长春：吉林出版集团，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4月版，页117）此一说法，流传甚广。而据我们手头上掌握的这一小撮材料表明，钱壮飞还有一个大女儿钱叶丽，这已经由权威得不能再权威的原中共中央调查部政治部以及邓颖超、罗青长本人所证

实。

（二）关于钱叶丽

1895年出生（据中调部材料。吉林版《钱壮飞》一书为1896年。本文从前者）的钱壮飞，一生中有两段婚姻，前娶徐双英，后娶张振华。

吉林版《钱壮飞》称，“1914年，钱壮飞刚满18岁，就在母亲的包办下，与徐双英结婚，次年生了一个女儿。”按文意，第一个女儿应是1915年出生。

惟据宁念慈1979年6月9日函称“我妈今年已经是六十六高令[龄]的老人了”计算，钱叶丽应为1913年生人。如果我们相信此说，那么，钱壮飞第一次婚姻应在1913年（钱如果1895年出生，当年恰好18岁），同年，徐双英生下钱叶丽（据中共湖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钱壮飞》一书所载《钱壮飞年谱》，钱壮飞与徐双英定亲、成婚是在1913年。见《钱壮飞》，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6月版，页207）。

又据宁念慈函，其母“还在十四岁时，由于革命形势需要，被迫与生身父母分离而寄人篱下”。而据钱叶丽致焦若愚函：“五十多年前（即一九二五年）我与辛亥革命的发端[起]人之一——宁协万教授结婚。”宁协万是否属辛亥革命的发起人之一姑且勿论，如果钱叶丽没有记错，她在十二岁时即与宁结婚（是否太早了点？），所谓“寄人篱下”，是否就是寄于宁家篱下呢？婚后，钱叶丽改名宁叶丽。

据手头上之多种材料显示，宁协万，1881年生人，长妻子钱叶丽32岁，长老丈人钱壮飞14岁。宁氏夫妇婚后一直居于北京（北平），西兴盛胡同七号，应为宁协万所购。宁协万逝于1946年，与钱叶丽有子女六人，分别为宁东京、宁柏林（女）、宁巴黎、宁念聪、宁恢怀、宁念慈（女）。1947年，钱叶丽再婚嫁与宣昌，有一子宣环。

关于宁协万，宁恢怀写有《回忆我的父亲宁协万》，宁念慈写有《回忆我的父亲宁协万先生》，均收录于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撰的《文史资料选编》第14辑（宁恢怀文网上可见：<http://www.ningcn.com/list.asp?id=223>，最后访问：2014年8月13日）。

北京版的《钱壮飞》，收有钱壮飞第二位妻子张振华1963年6月的一个谈话记录，其中提及：“大姐（原书注：这里指钱江的大姐）名叶丽，她比二姐黎

莉莉大两岁，是属鼠的，1912年生，她虚岁16时出嫁的。大姐结婚时，壮飞已入党了。她结婚时有照片，并注有年、月、日，可以查出来。记得大姐还放过哨。大姐夫是教授，记得当时我们没有钱用，向他借钱，还开了借条。解放后，他家庭困难，李部长（注：指李克农）还接济了他们一些钱。”（北京版《钱壮飞》页50）

黎莉莉著《行云流水篇：回忆、追念、影存》（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12月版）多处提及她的姐姐（很奇怪，没提名字）及宁协万。如“还不到七周岁，妈妈把我和九岁的姐姐送到一所天主教创办的笃志女校寄宿了一段时间”（页4）。“宁协万趁他一次公差，把我带到了上海，拜琴雪芳为师”（页7）。“当时宁协万在上海有公务，他把姐姐也接到了上海”（页7）。黎莉莉甚至还提及到“住在兴盛胡同的日子”：“从琴雪芳家跑回来时，姐姐已与宁协万结婚。宁家已有两男两女四个孩子，是前妻所生。此时我家租住宁家的房子，我和那四个孩子常常一起玩耍。”“兴盛胡同宁家房子，至今还在，宁家的后辈还住在那里。我去看望姐姐时，走进胡同见那盏路灯总要回忆起小时候在路灯下跳舞情景。”（页8）

（三）关于钱椒（或钱椒椒）

吉林版的《钱壮飞》一书称，“长女钱椒，女婿刘杞夫。夫妇二人在1929年至1931年期间共同跟随钱壮飞在南京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来刘杞夫回到湖南老家，从事教育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因病去世。钱椒解放后回到上海，在上海博物馆工作，1977年11月病故。”坊间有关1931年钱壮飞要刘杞夫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送达李克农处的事迹，已广为流传，吉林版《钱壮飞》一书亦有详尽描述，此处不赘。

惟如果钱叶丽是长女，钱椒即非长女而是钱壮飞与徐双英的第二个女儿。钱叶丽生于1913年，钱椒按常理最早也得生于1914年，或1915年。按此推算，钱椒1929年与刘杞夫结为夫妻“跟随钱壮飞在南京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年仅十四五岁（一如姐姐钱叶丽，钱椒也属早婚的）。时刘杞夫年龄有多大？我们没有材料。

张振华在1963年的谈话中称，“椒椒（原书注：“椒椒”，即钱椒）的丈夫叫刘杞夫。椒椒比黎莉莉大一岁，现在五十多岁，在上海历史博物馆（跑马厅

附近)工作。椒椒和刘杞夫被捕后,被关了几个月放出来了。刘杞夫被释放出来后,在一个学校教书。刘杞夫在南京时是党员。1946年,他因为得传染病病故,死的时候已不是党员。”(北京版《钱壮飞》页50—51)张振华在这里并没有说情报是刘杞夫送去的,而且,关于钱椒的身世,张振华说得也很含混。如果钱椒比黎莉莉大一岁,那她就应该是钱江的二姐,黎莉莉只能排为三姐,这与她在前面所述“大姐名叶丽,她比二姐黎莉莉大两岁”显然是有矛盾的。

有关危急关头智送情报化险为夷这一段惊险历程,未见有中共方面直接当事人的回忆。敌人方面,徐恩曾曾回忆称,“顾顺章表示愿意转变之后,立刻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说出追随我左右,掌管机要文书的一个得力助手,原来是共产党派来的奸细,这使我大为惊讶。此人系我在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负责筹备中国无线电商报时招考进来的职员,以我三年来的观察,相信他是一个不怕辛劳,忠于职守的干练青年,平日埋头作事,不问外务,沉默寡言,事情做得又快又好。这样一个循规蹈矩的模范职员,竟是共产党派来的间谍,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报告顾顺章被捕的电报,就是他亲手译出,当面交给我的。当时我尚存万一之想,希望这个消息不是事实。但等到我派人去找,果然,就在前一天的早晨,他已悄悄溜走了。”(徐恩曾:《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载传记文学杂志社编:《细说中统军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2年6月版,页157—158。)

徐恩曾所说,只是他不愿回首的一个事况大概。未有提及其中起了重大作用的钱壮飞女婿,也并不奇怪,他可能根本不知有刘杞夫其人存在。但令人奇怪的是,宁念慈提及文革中“我们家的亲戚,大舅、大舅妈、二舅(钱一平)、三姨(黎莉莉)、三姨夫(罗静予)没有一个不被揪出来的”时,并未提及按吉林版《钱壮飞》的说法当时应在世的钱椒!无论钱椒当时际遇如何,宁念慈在写信给极熟悉中共情报史的罗青长时,对他们家族中这样一位重要人物,理应提及。

黎莉莉的《行云流水篇:回忆、追念、影存》,提及到了她的姐姐(没有提及名字,但姐夫是宁协万),一句也没有提及家族的英雄钱椒、刘杞夫。自然,不提及不等于就没有钱椒此人,惟此处的不提及,总使人有所疑惑。

钱江告诉我们:“我的父亲钱壮飞、母亲张振华都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党员。1929年,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我父亲打入国民党最高情报

机关，为党做秘密情报工作。1931年，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危及上海所有党中央负责同志的安全。千钧一发之际，父亲携带截获的绝密情报连夜赶赴上海向党中央报告，使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在敌人下手之前安全转移，转危为安。这之后，我父亲辗转去了苏区。就在他离开南京的第二天，姐姐、姐夫因掩护过父亲，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我们全家人流离失所，当时我只有11岁，和小外甥沦落在南京街头，后来又流浪到其他一些地方。1940年，我们到了重庆。”（钱江：《泪别邓大姐》，<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86373/5963906.html>，最后访问：2014年8月7日）

钱江在这里提到了他的姐姐、姐夫（没提名字）。惟如按钱江所言，截获的绝密情报是钱壮飞亲自携带，连夜赶赴上海向中央报告的。

（四）关于黎莉莉（即钱蓁蓁）

有关钱壮飞的第二段婚姻，吉林版《钱壮飞》一书称，1915年，钱考入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在学习期间，钱壮飞结识了一位同窗好友张振华。出生于1894年的张振华（注：据钱江称其母1962年七十岁生日，推算张振华的生年应为1892年。张振华墓碑上的生年为1893年），比钱壮飞大2岁。”“1919年10月，两人结为伉俪。”

在谈到钱壮飞的儿女时，吉林版《钱壮飞》称，“二女儿钱蓁蓁是30年代著名的电影明星。她出生于1915年6月2日，在她还很小的时候，钱壮飞、张振华夫妇就参加了革命，无法照顾孩子们。”黎莉莉在自述其身世时，也自称1915年出生在北京，母亲是张振华（石曼编著：《黎莉莉》，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4月版，页6—7）。

问题在于钱壮飞1915年中学毕业进入医学专门学校时，应该过了暑期，他的入学时期应不会早于六月份。即便他入学后马上与张振华好上了，孩子也要怀胎十月，怎么也要到1916年才出生呀！（即便退一万步来说他们是寒假后入学的，怀上孩子到出生至少也要到1915年年底吧？）

故此有人便推测道，黎莉莉应该不是张振华而是徐双英的孩子。至于这一推测，据说黎莉莉从来都是否认的。

黎莉莉在《行云流水篇：回忆、追念、影存》中，并没有提到她的生年，不过，她倒是提到“父亲、母亲早出晚归，除了在北京国立医科专门学校学习，

还忙其他事，当时我年幼不甚清楚。”（页3）这似乎表明，父母尚在读书阶段，她已出生。

至于张振华本人在1963年的谈话中，只承认钱江是她所生——“也就在医专毕业这年生了钱江。”（北京版《钱壮飞》页49）

钱蓁蓁与钱叶丽的共通之处是，她们都很早就改名换姓，离开了父母。《黎莉莉》一书称，“黎莉莉不到7岁的时候，就离开母亲寄宿在学校；9岁，当了人家的过房女儿；10岁，去上海求艺；11岁，变成侍候别人的丫头。”（页6）

至于黎莉莉后来的经历，平面及电子媒介多有描述，不赘。

（五）关于钱江、钱一平

根据公开资料，钱江是钱壮飞的长子，1919年生人。钱一平为钱壮飞的二儿子，1924年生人。一般认为，而且他们又各自承认，他们的生母均为张振华。惟在2011年以钱一平名义发表的一篇文章却称，“我是父亲最小的孩子，我的姐姐钱椒曾随父亲工作在情报工作的第一线；同父异母的哥哥是曾拍摄《中华儿女》的著名摄影师、导演钱江；二姐黎莉莉，则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著名的‘默片皇后’。我想，哥哥姐姐的文艺才能，一定都是遗传自父亲。”（钱一平：《“我的父辈·英烈篇”——钱壮飞》<http://news.xinmin.cn/t/xmwbjtj/2011/06/10/11097707.html>，最后访问：2014年8月7日）

如此言属实，钱一平的生母是谁？话说回来，生母是谁，真的可能并不那么重要，值得注意的倒是，钱一平只承认“姐姐钱椒”、“二姐黎莉莉”，他是不承认有钱叶丽此人的。

（六）最后，关于宁念慈

1986年间，中国媒体公布了一宗被破获并判刑的“卢顺序、宁念慈、俞德孚特务案”。具体案情今在互联网上极易查到，其中提及：“一九八四年六月，被告人卢顺序受北京航空学院邀请来华讲学。来华前，卢顺序接受了台湾国民党军事情报局的派遣，以讲学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卢顺序到北京后，以物质利诱等手段，拉拢被告人宁念慈帮助其进行特务活动。尔后，卢又指使宁与居住在美国旧金山市的台湾国民党军事情报局驻美直属员杨鹏（化名杨宗山）直接取得联系。一九八五年三月，卢顺序离华后，宁念慈在杨、卢二人指使下，于同年四月至九月间以托我出国人员带东西为名，先后三次向杨鹏、卢顺序提供我经济、外

事等机密情报和内部文件数份。”“一九八五年十月中旬，卢顺序接受台湾国民党军事情报局的派遣再次来北京，发展宁念慈正式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向宁传授了密写和收听特务电台指示的方法，传达了给宁规定的化名、代号和任务。此间，宁念慈向卢顺序提供了我军事方面的情报。卢顺序和杨鹏先后给宁念慈特务活动经费及酬金八百一十美元。”“被告人俞德孚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间，明知其妻宁念慈已参与特务活动，还积极向宁提供我军事方面的情报，并向宁表示愿意一起进行特务活动。”1986年7月25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以特务罪判处卢顺序有期徒刑十二年；判处宁念慈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判处俞德孚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同年8月20日裁定维持原判。^①

根据笔者手头上的材料，此案其中两名被告宁念慈、俞德孚，的确就是钱叶丽的女儿、女婿，亦就是钱壮飞的外孙女、外孙女女婿。有所不同的仅是，1980年代初的材料显示，宁念慈时为北京608厂技术员，俞德孚则在中国电影家协会工作。到案发时，宁念慈系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所工程师，俞德孚系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编导兼摄影。

作为著名的“龙潭三杰”之一、中共大力表彰的英雄之后人，宁念慈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与其外祖父截然相反的道路，的确令人费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宁念慈夫妇之所为，实为钱氏家门之不幸！可能因此之故，钱家其他后人根本不愿提及宁念慈，祸及其母钱叶丽也似乎要从钱氏族谱中剔除，从钱氏后人记忆中抹掉（张振华谈话中有所提及，但那是1963年的！黎莉莉有所追忆，但不提及名字），也就毫不奇怪了。

^① 卢顺序、宁念慈、俞德孚特务案，
<http://baike.so.com/doc/7246864.html>，最后访问：2014年8月13日。

【卞案研究】

“卞仲耘命案”争论拾遗

——对刘进、宋彬彬解释的质疑

华新民

由于宋彬彬等人在今年初的道歉，卞仲耘命案以及围绕它的一系列争论又热闹了一阵。几个月过去，在各方把自己要说和能说的话说完以后，现在看来又归于平静了。类似的争论，在笔者记忆中已经发生过两次了。第一次是2003年，卡玛摄制的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在北美上映，是宋彬彬第一次在公众媒体上替自己澄清和辩解，在海外留学生为主的人群中引发了争论。第二次是2007年，宋彬彬在师大女附中90周年校庆时被评选为“知名校友”，引起了海内外人士的广泛注意和批评，包括受难者亲属的抗议。这一次的争论已经是第三次，今后是否还会有第四次、第五次呢？即使有，也不会多了——对卞仲耘命案这一文革历史事件的追究和争论本身，也将伴随着岁月流逝和当事人的老去，成为一段历史：探索历史真相的历史。

趁着它还没有完全成为历史的今天，笔者作为几十年来一直关注此案争论的局外人，注意到这段“历史的历史”尚有一些因利益相关或环境所限而被人们有意无意地遗漏的方面未被论及，在此作一些拾遗补漏的议论，供此案的涉案者、研究者和关注者思考。

……“开国上将”宋任穷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事，是宋彬彬及其辩护者极力回避的话题，好像提及此事，就跟当年凡事都要问出身的“血统论”一样。事实上，对于在北京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高干通过子女影响文革的进程，或者指导子女在文革中的行为，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刘少奇、邓小平在文革初期，常常通过自己的子女了解他们所在学校的动态，并且做出一些评论，这些评论就会通过他们的子女传到学校工作组领导的耳朵里，成为这些领导的重要指南。文革初期许多北京大中学校里被选举出来的文革委员会一类领导机构，不管是在工作组撤走前还是撤走后，高干子弟常占据大多数，其原因除了他们的高调强势表现之外，也确实是“民

意”所归：大家觉得他们对中央领导的动向了解得比较及时和准确，跟着他们不会犯错误。很多平民（包括中下层干部）的子女在文革初期注意高干子女的言行并根据他们的行事方式来决定自己的行止，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文革后，这方面的史实也有很多披露，如宋柏林的日记《红卫兵兴衰录》中就记载了干部子女的家庭内部消息先于中央正式传达渠道的一个例证：宋柏林8月2日的日记记录：“从矿院附中那得到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最热烈地支持我们的造反。”这一消息比王任重代表中央向清华附中红卫兵宣读这封信早了一天。矿院附中的这个抄件，来源于该校学生杨冀平的父亲、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陈小鲁对此也并不回避，坦言他跟父亲在文革中的交流和互动，以及周恩来对他的保护措施。比如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后，陈毅就给儿子通消息：“你前一段，毛主席给你做了结论了。毛主席在会上说：陈小鲁好，反对打人。前一段有结论了，你以后要注意，不要到处惹是生非。”^①

而宋彬彬对此讳莫如深，难道宋任穷能够特立独行，对子女没有一点关照？笔者提出这个问题，倒不是追究宋彬彬在“八五事件”中的行为，背后有其父亲的提示，从而把卞仲耘命案同高层官员联系起来。而是对她在“八一八”后的行为有些疑惑：她在“八一八”的第二天就宣布退出文革筹委会；对于御赐的名号“要武”觉得这是毛主席的一句“玩笑话”，^②采取一种不冷不热的态度；对于来自全国给宋要武的信，连看都不看一眼。这些行为显然有违当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氛围；也不合当时红卫兵对领袖狂热崇拜的心理。她们的老师刘秀莹在2008年5月对刘进说：“……都以见到毛主席为光荣，给毛主席戴袖章何其光荣，毛是红卫兵中的一员了，你们连做梦都会乐醒的。”^③实际上是提醒刘进和宋彬彬：你们当初可不是现在回忆中所说的那种心情。宋彬彬如果真的有那种对领袖恩宠淡漠到近乎“大不敬”的行为，不免令人猜测背后有长辈高人的提示。

经历过文革的人大多记得，8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以套红标题刊出消息：“昨晚7时15分，毛主席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群众说，‘你们

^① 陈小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二册。

^② 冯敬兰等：《也谈卞仲耘之死》，《记忆》第47期，2010-04-28。

^③ 朱晓茵、刘进等：《刘秀莹老师谈女附中文革》，《记忆》第108期，2014-02-15。

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宋彬彬竟然在这条“最高指示”发表的八天之后，在刚刚承受伟大领袖恩宠的第二天就急流勇退，宣布退出文革筹委会！而且不久就远离文革运动，成了逍遥派。从带头响应领袖号召到违背领袖教导，难道宋彬彬内心在几天之内真的发生了如此突兀的转折吗？原因在哪里呢？人们自然会把目光转向她的长辈。乃父就在一星期前在中共领导的核心圈内更上层楼，亲历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中央全会上惊心动魄的交锋，或许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站队，或许得到更高领导的某种“交底”，从而对子女有所告诫，是很合乎常理的事情，没有必要讳言。否则，难免给人以虚假的印象。

诚然，宋彬彬对自己的上述行为也给了解释。她在《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中说：8月18日从天安门回到学校，原来反工作组的一位同学“对我给主席献袖章很气愤，她认为我们犯了保工作组的错误，没有资格给毛主席献袖章。还说这样做是不分是非，不利于运动向正确方向发展，应该纠正。我们觉得她说的对。”

一个人的心理，又是几十年前的心理，旁人很难判断其真伪，不过，从一些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来看，这段回忆中的情节和其中人物的口气，很难拼接到1966年8月18日所有红卫兵盛大节日的氛围中。这里所说的历史事实是，“八一八”以后，和宋彬彬处于相似地位的大、中学里的学生领袖，找不出哪个人和宋彬彬有相似的心理和行为。相反，他们受到“八一八”的鼓舞，比原先更积极地投入运动中去。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例如，八中的领袖陈小鲁，工作组时期甚至被吸收成为工作组成员，犯的错误不会比宋彬彬小吧？然而工作组撤走并没有影响他在学校里的领导地位，还在8月25日组织起了“西纠”。他们不仅不觉得自己跟着工作组犯了错误，不再能领导同学进行文化革命，反而觉得自己有资格去纠察其他中学的红卫兵。

如果我们将目光聚焦在1966年8月份，就会看到，当时工作组撤出还不到一个月，毛泽东讨伐刘少奇的大字报内容还没有公开，撤销工作组的最初的理由只是为了“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虽然以中央文革为主的领导人在北大等学校的演讲中指责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当时中央文革刚刚公开亮相，他们的意志只是在其控制的北京大学得到贯彻，在其他学

校并不像后来那样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同，有一言九鼎的分量。受到工作组迫害的少数派，正在为平反而抗争，为销毁黑材料而上访、静坐，自己还没有翻过身来，哪有功夫去追究那些工作组时期受到重用的同学犯了什么错误？

即使是在清华大学这样工作组同反对派学生严重对立的学校，在八月份，多数学生对所谓工作组的错误并不以为然。蒯大富等受到工作组迫害的学生虽然已经平反，但是大多数同学并不认为他们代表了正确的方向和路线。例如，清华大学当年的学生领袖孙怒涛在《良知的拷问》一书中这样回忆1966年八月清华大学里的形势：

一批人认为工作组已经检查了，可以过关，下面应该立即斗黑帮。另一批人认为不先把工作组的错误批深批透，消除同学之间的严重隔阂，怎么能万众一心斗黑帮呢？而“临时筹委会”提出的建议是，“根据大多数人意见尽快打黑帮”。坚持要批工作组错误的这部分师生串联起来，于8月8日成立了一个“八八串联会”……。要立即斗黑帮的那部分师生，不甘示弱，第二天也组织了一个“尽快打黑帮串联会”，后来简称“八九串联会”。8月19日，在“自控系红卫兵”的基础上成立了“清华大学红卫兵”。头面人物是贺鹏飞、刘涛、刘菊芬等高干子女。它的外围组织就是“八九串联会”，所以这个红卫兵的别名又叫“八九红卫兵”。“八九”派的观点，表面上听起来似乎也很有道理：工作组的方向性错误是斗学生而不是斗黑帮，改正工作组错误最实际的行动就是立即转为斗黑帮。

孙怒涛这里提到的那些高干子女，都是工作组重用的依靠对象，同宋彬彬在学校里的地位相同，从他们当时的行为看不出有什么犯了错误的思想包袱。贺鹏飞还在8月24日，把北京市的中学红卫兵招到清华，实行撕大字报、砸校门以及殴打学校领导和教授的暴力行动，其势汹汹，不要说认错，就连一点收敛的迹象都没有。孙怒涛还回忆自己曾自以为“根正苗红”，想报名参加高干子女成立的红卫兵，却因为反工作组的历史而吃了闭门羹。可见在1966年8月份，原来反工作组的人并没有扬眉吐气，原来保工作组的人，也没有垂头丧气，双方充其量是处于相持状态。

事实上，工作组的问题被上纲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度，要等到那一年10月份，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的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中正式才提出来。同一个月里还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在会上作了《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的发言，明确提出文革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并指出刘、邓通过工作组推行的路线，就是毛泽东在8月5日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说“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在此之前的八、九两个月中，发生了“红八月”以“破四旧”为名义的抄家打人风潮、红卫兵大串联把运动推向全国、外地学生进京接受毛泽东检阅等事件，这些都是发动群众时期必要的过程，并不是运动目标。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在十月份发社论，开会议，就是要把已经发动起来的学生引向到他们的目标——摧毁刘邓司令部。而通向这个目标的道路就是清算他们在六、七两个月的“五十多天”时间里，“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的罪行。正是这种引导，反工作组和保工作组两派之间的相持阶段才告结束，使得原来受到工作组镇压的持不同意见者成为主流语言中的革命造反派。也只有在此以后，被工作组迫害的反对派学生才有底气在保工作组的同学面前谈论谁是谁非；也只有在此以后，工作组时期得到重用的学生领袖才可能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而宋彬彬却在8月18日当天——正是最有恃无恐的时候——经不起反工作组派的一番言辞就落荒而逃。如此超前的行动，更像是一段错置的“故事”而不是真实的历史。

1966年8、9两个月的形势，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探究：北京市第25中学生李冬民是该校反工作组派的领头人，后来成为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的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不过那是八个月以后的事。据他在《几度风雨几度秋》中回忆，工作组领导运动期间，曾召开全校大会对他们进行24小时日夜不间断的批判斗争，扣上了吓人的“现行反革命”帽子。工作组撤走以后，反工作组派的待遇稍有改善，不再受到看管关押，但是当有人提出工作组整学生错了，马上受掌权的红卫兵压制。他们无法在学校立足，只能到校外去串连相同观点的学生。他们在北京城区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战友，在9月16日成立了北京市中学反工作组派的联合组织“首都兵团”。如果宋彬彬上面所说的退出文革的原因和过程是真实的话，那么8月19日

后，师大女附中那些理直气壮的反工作组的学生应该成为本校运动的领导，并且开始对工作组错误的清算，控诉工作组对她们的迫害。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师大女附中可算是北京第一所这样做的学校，领先于其他所有学校至少一个月。这样一支特别有战斗力的队伍，即使不被中央文革树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样板，至少也应该是“首都兵团”第一批骨干成员。然而笔者没有看到有关的回忆和证据。

人们看到的是相反的回忆：同李冬民的第25中或其他中学比较起来，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对反对派堪称温和。根据刘进回忆，6月17日有13个同学贴大字报指责工作组，工作组组长在对学生的广播中对此作了解释，同时他检讨了自己有“怕乱”思想，“还不够放手”，表示欢迎继续提意见。后来6月27日，又有18人贴出了第二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为此部署了“7月7日、8日、9日三个半天开辩论会”。辩论的一个对象不到学校，工作组似乎无可奈何，只能“缺席辩论”。^①可见，工作组并没有像毛泽东后来指责的那样“围剿革命派”“何其毒也”，工作组下面的学生领袖更谈不上有什么责任。试问，刘进、宋彬彬等没有参与过对反工作组学生的镇压，犯错误的心理负担从何而来？至于说跟着工作组犯了“求稳怕乱”的错误，那么为了改正错误应该是更激进和不怕乱，这正是其他学校的学生领袖的行为，像刘进和宋彬彬这样完全退出运动是绝无仅有的。

所以说，宋彬彬在“八一八”之后的行为，只有两种解释：或者记忆发生错位，或者有“高人”在背后点拨。也许还有本文尚未看到的解释，需要对师大女附中在“八一八”前后的历史作进一步的调查，才能够澄清这个问题。陈小鲁在这一点上是颇有见地的，他建议：“研究要突破‘八五事件’”，“对女附中文革进行整体研究，从1966年初到1969年老三届离开学校”。^②他或许也是对“八一八”后发生的事不无疑问——全北京的红卫兵都还在傻乎乎地冲冲杀杀，你们俩却悄悄开了小差，真的有这回事？干部子弟明白过来退出运动，最早也在十月以后，你们哪来的先见之明呢？

2014年8月6日

此文摘自《卞仲耘命案争论拾遗》，载《文革博物馆通讯》zk1408d

^① 冯敬兰等：《也谈卞仲耘之死》，《记忆》第47期，2010-04-28。

^② 陈小鲁：《我的想法和建议》，《记忆》第106期，2014-01-15。

【卞案研究】

我为什么要退出女附中的文革筹委会

——简复华新民先生

刘 进

华新民先生文革时在科技大学读书，他一直关注文革研究。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是仔细阅读了相关资料，并做了认真的思考和分析之后才提出的，这种严肃认真地探讨历史真相的态度，值得尊敬。

华先生认为，我和宋彬彬在“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红卫兵运动最鼎盛的时候，就退出了运动是违反常情常理，因此是难以置信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谈到过，这里再做一简要的解释，作为对华新民先生的答复。

文革初期，工作组在校期间，虽然我们是学生，不是决策者，但我们是拥护者、执行者；虽然是按运动部署和上面精神做的，但他们犯的错误我们都有份，包括批斗校领导打击反工作组的同学。

7月底，昨天还觉得是在跟党干革命，今天就是跟着工作组犯了阻碍革命的错误了，我们能不迷茫吗？当时真是一片迷茫。“八五事件”卞校长被打死，更没有方向了。因为怕再出事，我才组织有反工作组人参加的校筹委会，我是主任。“八一八”后，反工作组的同学声泪俱下、推心置腹，对我们错误的严重性指得明明白白。我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怎么可能还要继续当这个筹委会主任呢？

第二天我和宋彬彬贴大字报声明退出筹委会。我们退出后，筹委会还有人维持做一些日常事务，不久也就散摊了。

1966年10月初，师大女附中的老师们组织的“星火燎原战斗队”写的《文革大事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八月十九日，筹委会负责人宋彬彬等人宣布解散筹委会。”这是有案可查的史料。

文革初，从6月2日贴第一张大字版，到8月19日退出筹委会，都是我自己的选择。宋柏林、陈小鲁从父母那里得到了上层的消息，这种情况在高干子弟中肯定不少。但不能一刀切。如果以宋柏林、陈小鲁作为证据，认定每一个高干子女都能从父母那里得到消息，这对复杂多变的历史的处理，未免有些简单化。

【卞案研究】

“八一八”之后，我的选择

——答华新民先生

宋彬彬

华新民先生的文章，给我提了若干问题。其实，这些问题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在我父亲的回忆录中，在同学的文字中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谈到过。华新民先生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他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网上很多言论也都是这么说的。问题是，事物是复杂的，不能靠推理，不能搞猜测，不能一概而论。

一、“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的第二天，即退出师大女附中的校筹委会，没有改掉原来名字，对毛泽东说的“要武”也缺乏应有感激和热情。华新民先生撰文质疑此事，认为陈小鲁从他父亲陈毅那里得到了上层的信息，“难道宋任穷能够特立独行，对子女没有一点关照”“宋彬彬如果真的有过那种对领袖恩宠淡漠到近乎‘大不敬’的行为，不免令人猜测背后有长辈高人的提示。”他还以宋柏林和陈小鲁为例，证明高干子弟会从父辈那里得到高层的信息。

事实上，我父亲宋任穷从不跟孩子提起任何党内消息，这是他的坚守一生的原则。当时我父亲在沈阳，与我根本没有联系。1960年我上中学前，我父亲就被调到沈阳工作，所以我一入校就是住校。所以，从父亲那儿得到什么小道消息对我来说是完全没有的事。

建议华新民先生读一读我父亲的回忆录。我父亲被党内许多老同志，甚至朱德、陈云等年长于他的老同志称为“宋大哥”。这里面是有道理的。我父亲一生对最艰难的开创性工作都是无条件地上，该摘桃子时则老老实实在地退。老干部中有许多他这样一心为民不求官不求利的人，这是当代的“官”和许多人无法理解相信的。

我父亲从来不结帮不结派，不居功不诿过，致使抗日时期的冀南和二野的一些老同志都对他有意见。因为当时冀南和二野还活着的老同志中，我父亲的职务最高。如果他不挑头安排，著书立传的工作就难以进行。冀北冀中的抗日，因为《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等电影而广为人知。

而我父亲所在的冀南地区的抗日斗争，并不比冀中冀北逊色。那里的“地坑战”、“地道战”具有别的地区所没有特色。我曾经参观过邯郸附近的峰峰煤矿，那里至今还保留着四通八达的地道，地道的坑壁上已有许多结晶体。这些历史不为人知，是因为我父亲不愿意宣传自己。他对二野的战史也采取同样的态度。

二、关于华新民先生所说的对领袖恩宠的“大不敬”。人的心理和行为有共性，也有个性。共性取决于大环境，个性取决于小环境，这个小环境包括家庭教育、父母影响、同学/朋友关系等。而正是这个小环境塑造了个人性格。华新民先生不相信的我的“大不敬”，是因为他只看到了大环境下的共性，而忽视了小环境中的个性。所以，他无法理解我当时的真实心理。华先生是清华人，他应该知道，清华的高干子弟并非都是铁板一块，他们有保皇的，也有造反的；有打人的，也有反对打人的。换句话说，不是每个高干子弟都必须是狂热的红卫兵造反派，虽然当时我们没有张志新等人的觉悟，但我们仍然保持着长期以来学校、家庭教育给我们的道德底线。我当时对毛主席的“要武”，对各地给“宋要武”信件的态度，是我的个人的意志，没有任何“高人”的指点。而且我当时的作法，即便在我们班的非红五类子女看来，也不意外。她们和我的想法认识是一致的。如果华新民先生一定要用他的推断去理解那时的我和我的同学们，那将是很主观，很片面的。

如果说，我背后有什么“高人”的话，那就是王任重，是他让我去保湖北省委，这是我退出学校运动后，推动我继续参加革命的唯一动力。

我本人对《光明日报》的做法只有气愤与困惑，怎么会去拆那些不属于我的，写给“宋要武”的信呢？对来学校看望我，把我当做“要武”的红卫兵，我都是好言相劝，劝他们不要武斗打人。我的这些言行，让许多来访者惊讶，以至不解。

三、与上面“大不敬”相联系的，是我对“要武”的理解。我从来不认为，主席说“要武嘛”，就是要我改名“要武”。连卡玛都说：“要武”多土多难听，谁会改这么一个名字啊！说实话，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坚持这么认为。我的同学朋友对这种逻辑都感到很奇怪：主席并没说你要改名“要武”啊！为什么你再三解释，主席爱用人家的名字开玩笑，“要武”就是他的一句玩笑话。人们就死活不相信呢？你的这种解释为什么就那么不可理解呢？

对不起，我认为这种坚持要我相信主席就是要我改名，不改名就是大不敬的

说法，实际是一种思维僵化的表现。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度不了，就给别人扣帽子，这还是文革的思维。文革开始不久，我和我的许多朋友就对江青的表现很反感，按这些人的思维，这是对领袖更大的不敬。可是，这种不敬，难道也不可以理解吗？一定要把主席的一句玩笑，让别人当成圣旨来理解执行，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变相的皇权崇拜，个人迷信呢？

四、华新民先生不理解，为什么我会在“八一八”之后退出筹委会。华先生引述刘秀莹老师对我们的责问做证据。我很尊敬刘老师，刘老师看问题很敏锐。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她说的每句话都是对的，她指出的问题每一个都真实存在，不会是虚假问题。刘老师在文革前就调走了，她跟华先生一样，也是从常情常理上推测。另外，她说的“给毛主席戴袖章何其光荣”，“你们连做梦都会乐醒的”是一回事，把主席的一句玩笑当真，改掉父母给自己起的，使用了十几年的心爱的名字是另一回事。换句话说，我可以为给主席戴袖章而高兴，我也可以为人家让我改名而愤怒。我可以为受到主席的接见感到无上光荣，而发誓革命到底，同样，我也可以为自己犯了资反路线错误感到无限悲痛，而痛改前非，退出筹委会。这两种思想感情并不矛盾，它们事实上都存在于我们的身上。

实际上，我们的转变并不是在几天之内：从7月底工作组撤走，到8月19日退出学校运动的20天里，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使我们跟不上，看不懂，自认为犯了严重的路线性错误，一直处于寻求革命之路而不得答案的苦闷彷徨中。女附中不少学生的特点就是“叫真儿”，不懂的就不能强迫我们就“懂得”，所以听了梁二同的责备，我们就退出了学校运动。这并不是我们就不再寻求革命，刘进开始串联去寻求什么是“文化大革命”；而我听了王任重的话去武汉却再次摔了重重的跟头。这一次我是被彻底摔蒙了，之后更没有参加文革的愿望和动力了。激流勇退成了逍遥派——从“中流击水”，转向了“中午击水”（游泳）。没有政治活动和政治诉求。很快我又被软禁于沈阳，后来，我逃到锡林郭勒盟插队。我的文革经历至此告一段落。

这跟反工作组同学是否追究我们无关。我们是真的认为自己错了，是自我反思。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反思自工作组撤走就开始了。我们和反工作组的同学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一点，华新民先生恐怕也很难理解。

华先生以清华为例，引用了孙怒涛先生的文章。我想说的是，“八九红卫兵”

的认识不能代表我们的认识。华先生的所有的武器，是从推测到推论，以清华的红卫兵的言行来推论我们，这是不是又成“血统论”？就像我们对红二代官二代中依靠父辈或自己权势的人鲸吞国有资产、贪污腐化之败类深恶痛绝一样，不能以出身论思维。

华先生在文章中得出的这样的结论：“宋彬彬在‘八一八’之后的行为，只有两种解释：或者记忆发生错位，或者有‘高人’在背后点拨。也许还有本文尚未看到的解释，需要对师大女附中在‘八一八’前后的历史作进一步的调查，才能够澄清这个问题。”

我们的记忆是否发生了错位，可以查阅“星火燎原战斗队”的《文革大事记》；我的背后是否有“高人”点拨，我前面说了，除了王任重没有第二个人，而王任重点拨的只是湖北的事。我希望，有人对师大女附中的“八一八”前后的历史做进一步的调查，澄清这个问题，解答华新民先生和众多读者的疑问。

最后，我要感谢华新民先生，感谢他的怀疑精神，感谢他深入到历史的细节之中，提出问题。没有他这样认真的追问，我也没有机会说这番话。

2014-8

【答疑】

编者按：本刊收到在校的大学生杜哲民先生的来信，信中说，他们使用的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下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8年初版，2013年修订再版）给了他很多的知识和启发。但是，党史专业的同学告诉他，有些重大历史事件这本教材没有编入。杜哲民先生询问本刊，这本教材遗漏了哪些历史事件。为此，本刊特地邀请北京服装学院的马昌海教授来解答这一问题。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下编）所遗漏的历史事件

马昌海

杜哲民同学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但是一直被忽略的问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确实对许多重大事件和问题避而不谈。这是这本教材的重大缺陷。兹将此教材（下编）中所遗漏的历史事件简列于下，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1. 1951—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批判影片《武训传》。
2. 1951年对李立三主持的工会工作的错误批判。
3. 1951—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利弊。
4. 1953年对新税制的批判。
5. 1953年对梁漱溟“小仁政思想”的批判。
6. “高饶事件”。
7. 1954年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8. 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运动。
9. 1955年的“肃清反革命运动”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10. 在展开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又发动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并继而宣布胡风等人为“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公然违反宪法，动用专政工具，将这些公民投入监狱，长期非法关押。
11. 《教材》对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历史进程的叙述基本没有。
12. 《教材》对以下史实未提及：1958年，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在毛泽东的赞同和指示下，在人民解放军内发

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以刘伯承元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中央军委会议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式，先后点了萧克上将、李达上将、陈伯钧上将、宋时轮上将、粟裕大将、叶剑英元帅的名字。德高望重的刘伯承元帅被迫上台当众检讨，萧克、李达等人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并编造出一个“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向中央、向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开了两个多月，撤销了萧克、李达在国防部和训练总监部的一切职务，训练总监部后被撤销。彭德怀在会议总结中将萧克定性为“一贯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解放军总政治部派甘泗淇、刘其人等组成的工作组到训练总监部对萧克、李达等人继续进行揭发批判。他们采用专政手段，把预先圈定的所谓“反党宗派成员”分别隔离、禁闭、监视，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总共有十几个人被打成了“反党分子”，被撤职、降职降级甚至赶出军队安置。其中的郭天民还被打成了“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的第二副帅。1959年5月14日，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报告，并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到军队团一级和地方地委一级，这场反教条主义运动才告结束。原总参谋长粟裕大将、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上将等将领也在受到激烈批判后被撤职。

13. 《教材》对以下史实只字未提：1959年的庐山会议以后，林彪继任国防部长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上台伊始，林彪便积极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当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学习马列主义“不一定都要读他们的原著”，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就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可以“一本万利”。1960年2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他进一步提出：学习毛著就是要背警句，“挑最好的，背上那么几十句就差不多了”。他还把毛泽东过去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写的题词，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概括为“三八作风”。

林彪的这些做法受到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的抵制。1960年9月至10月，林彪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对谭政及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傅钟等人

展开围攻，并通过了一个《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不久，谭政等人被升级成“反党宗派集团”。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谭政被调离军队。在打击谭政的同时，林彪从批判彭德怀的“单纯军事”观点出发，提出了“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的所谓“四个第一”，将主观唯心主义的意志论随便套用，把精神的反作用夸大到了极端，把政治、思想工作置于至高无上、凌驾一切的地位。然而，毛泽东却对此大加赞赏并予以支持。后来，林彪又陆续提出了“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背诵毛主席语录立竿见影”，“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一套极左的东西，使军队建设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可在毛泽东看来，人民解放军不仅做到了“又红又专”，而且其“成功”的政治工作经验完全可以推广运用到全国各行各业。1963年3月，毛泽东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作为一个时代的楷模，雷锋曾影响了几代人。但是，对雷锋及后来的欧阳海、谢臣、王杰、刘英俊等模范人物“高、大、全”式的片面宣传，尤其是强调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和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军队模范人物的不断涌现，也对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成功”做了恰当的注解。再加上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胜利，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等因素的影响，人民解放军的声望如日中天，军队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愈发显的重要。这一切都为林彪积累了政治资本。在林彪大搞突出政治，“高举毛泽东旗帜”的同时，军队内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日趋炽烈。尽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肇始较早，但1960年代的这种崇拜，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人为的，并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与编织，很快演变成了一场绝对迷信毛泽东的现代造神运动。1960年，林彪开始掀起了把解放军变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运动，并企图用这所学校来教育全国人民，为自己赢得更高的声誉。1964年5月，解放军总政治部首先公开出版了《毛主席语录》。在这本“小红书”的再版前言中，林彪无限度地夸大毛泽东言论的普遍效力与巨大威力，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要求人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在林彪的刻意迎合下，毛泽东越来越乐于接受对自己的崇拜与迷信，对林彪的做法也就更加欣赏与支持。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号召背后，隐含着个人迷信的泛滥。这样的恶性循环，既为林彪实现野心创造了机会，也为后来“文革”期间个人迷信的登峰造极

打下了基础。

14. 《教材》对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和毛泽东对王稼祥的所谓“三和一少”方针路线的批判同样没有提及。

从1964年开始的大规模的三线建设，标志着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发生了转变，即由以发展农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中心转向了以加强国防实力、重视工业，准备打仗为中心。这一转变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左的国际战略与对外政策的影响所致。此时的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中苏、中印关系恶化，美国在越南的战火日益扩大，国民党军队又不时骚扰东南沿海，美国与日本有“安保条约”关系，又在南朝鲜驻有重兵。中国三面受包围，险象环生。但毛泽东所提出的战略口号却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一切反动派”，并在物质和道义上承担着支援亚、非、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重任。在与苏联争当世界革命导师、领袖和旗手的希图因中苏关系的破裂而失败以后，中国加强了对东南亚及亚洲周边国家输出革命的活动。对此，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等人有不同看法，要求纠正对外工作中的左的偏差，改变中国僵硬、孤立的国际处境。毛泽东却坚持挑战外交，试图以“天下大乱”来促进世界革命和亚、非、拉美民族解放运动，当然不能接受这种意见，王稼祥等人也就难逃被批为“修正主义”的厄运（所谓“三和一少”，即毛泽东认为党内王稼祥等一些主张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援助少一点）。至于对修正主义的认识，毛泽东由国际上的“反修”（南斯拉夫、苏联），自然引伸到了国内党内的“防修”，“修正主义”已成了他认识上的大敌（有关“修正主义”的概念，在全世界至今都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另外，《教材》未提及的重要史实还有：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与被干扰。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仅仅发展单一类型的全日制学校，既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人才的大量需求及青年人求学的强烈欲望，也难以解决尽快普及教育及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相脱节等问题。为此，1957年11月，刘少奇曾建议试办半工半读学校。1958年5月30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我国应有两种主要的教育制度与劳动制度同时并行：“一种是现在全日制的学校制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学校制度；一种是八小时劳动制度，一种是四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在他的倡导下，各地区竞相实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教育事业大幅度紧缩。1963年后，因中、小学毕业生升学与就业问题十分尖锐，从1964年起，刘少奇再次提出了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观点。随之，又掀起了一个兴办半工(农)半读学校的热潮。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构想，有利于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有利于扩大劳动就业，也有利于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结合及改革，因而具有积极意义。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这种“双轨制”却很难按照刘少奇设想的那样健康发展。由于升学、教学水平、学校设备、生源以至声誉等因素的影响，往往会导致全日制正规学校的“成功”与半工(农)半读学校的“失败”。

自1957年反右以后，“左”倾思潮在教育界颇有市场。学生考学，毕业分配，越来越强调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或遭打击批判者的子女，在升学、安置诸方面，往往要受到种种歧视和限制。在学校里，政治教育被突出到了居高临下的位置，经常冲击专业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在左倾思想重新抬头和泛滥之际，随着阶级斗争理论的日益升温，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教育工作会议(即春节座谈会)上批评：“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方法不对。我看教育要改革，……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我看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现在的考试办法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毛泽东主张改革教学方法，适当减轻学生负担，提倡自学精神，无疑很有见地，但是笼统地不加分析地指责考试方法，轻率地断言要砍掉一半课程，则显然是错误的。

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阴云笼罩下，教育事业仍在荆棘丛中向前迈进。1965年比1957年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就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其中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个“五七指示”后来成了实行“开门办学”的依据，全日制教育也遭到强烈冲击。

【口述】

郑州文革武斗和“文攻武卫”口号（三）

——原河南二七公社“火指”负责人袁庚华专访

袁庚华口述 李素立采写并整理^①

访谈时间：2013年12月24日下午预访，

2014年3月21日、4月23日下午和晚上。正式访谈。

访谈地点：袁庚华家

受访人：袁庚华

主访人、整理者：李素立

访谈方式：录音、笔记

主访人的话：

袁庚华，湖南湘乡人，1946年生，初中未毕业，到郑州肉联厂作学徒工。文革中成为河南全省的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的重要骨干，也因文革政治问题四次入狱，累计被囚十数年。1989年出狱后经商，并经常到全国各高校去讲学。在原《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的《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P63-65）一书中，袁先生被称为近来“引起公众注意”的一位“老左派”。海内外多家媒体称其为“毛派思想家”。

一年前，笔者在“郑州思想沙龙”认识了袁庚华先生，有了采访他的机会。对过去的经历，袁先生思路清晰，侃侃而谈。虽然对他的一些观点笔者并不赞同，但他在文革中的“造反”及武斗经历还是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兴趣。更令笔者大感意外的是，文革中家喻户晓、文革后“臭名昭著”的口号“文攻武卫”，袁先生说是他先提出来，并经江青首肯的。

那么它是怎么提出来的？又与郑州武斗的发生、发展和结束有什么关系呢？他的叙述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① 本稿经袁庚华审订、补充、修改——李素立。

七、7·16“郑纺机战役”：

“我们六个人……，知道都要死在这里了”

彻底转变形势的7月份，有两场战役：7月16号郑纺机战役我们败得很惨，7月26日烟厂决战，“二七公社”胜利了。后者彻底转变了河南形势。

7月16日是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周年，“二七公社”在市体育场召开大会。下午，北郊各单位的游行队伍经南阳路回去，路过郑州纺织机械厂门口的时候，遭遇路西厂区保守派的埋伏，砖头钢块劈头劈脑打过来了，我方撤到路东，双方相持。应该说我方开始是不服气和轻敌，要在还没有发生过大型武斗的北郊工业区和保守派决战。

我是黄昏时才赶过来的，任延庆、单长春也来了。晚上，我们在郑纺机医院召开作战会议，综合各方面情况：这是对方早就策划好的一场阴谋。据郑家声他们在京广铁路边的一个观察点反映，省军区从安阳等地调来保守派几万人，火车汽车从下午到晚上一直没停。当时估计他们总兵力最高可能达到13万人。我们从西郊调来的主力援兵被公社的“策略派”用谎言截回去了，原有1万多人又被他们调走一部分，现有不到7000人。我主张撤，这仗没法打。但造反派群众包围住我们开会的小楼喊口号，坚决反对逃跑。

第二天早上，我们只好集中兵力，推倒围墙，孤注一掷地向南面的露天舞台进攻，想打掉他们的指挥部，然后体面地撤。但是，我们发起几次冲锋都被打回来了，我前面的战友被长矛刺中肚子，白花花的一大堆肠子都拉出来了！我们就退回到马路东边，正准备撤退，对方全线进攻了。

他们用海防喇叭吹起冲锋号，震天动地。先是“火力”攻击，钢块配雷管铺天盖地打过来了。然后是看不到边的人群成整齐的队形，挺住长矛如潮水般涌来。我身边两个打旗吹号的，都趴在地上，雷管炸来炸去。钢块砸到头上，都是血。有的被砸昏了。

李：都是扔过来的？

袁：都是大弹弓打过来的啊。我们全线溃退，往东边撤。

李：他们没有把你们包围？

袁：他们从对面一线攻过来的，后来就有包围的意图。

我带着十几个人去处理指挥部的东西。其中又有几个人先走了。就在几千人退的时候，经过东边奶牛厂时把奶牛惊了，后走的这几个人又被奶牛抵死了一个。剩下我们六个人冲出去的时候，在空旷的田野上已看到人家的先头部队，从两边包抄过来。截住我们退路的，有五六十个人左右。我们六个人互相看了一眼，知道都要死在这里了。此时，我的心情很坦然，北京的谈判已经进行六次了（共八次），中央的态度越来越明确。也就是说已经见到胜利的曙光了，死了值了！我们唱起毛主席的语录歌（唱）：“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当年武斗中还有另一首林彪的语录歌（唱）：“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这类歌曲只有造反派唱，保守派不会唱，他们没有这种感觉。就像文革前全国人民都会唱的“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文革中全国各地都只有造反派唱，因为造反派受压，只有毛主席才能给他们希望。

接着谈拼刺刀。这时武斗已经发展到用焊有刺刀的钢管长矛了。对方有一个人把我手腕刺流血了，我满手都是血，估计当时我拼红眼了，他可能也被我可怕的表情吓倒在地。我完全可以顺手刺他一刀，但看到他满面的恐怖，就放过了他。

李：拼刺刀，你砍死的有人没有？

袁：没有，一个都没有。

李：那你们拼刺刀，不是你死我活的吗？

袁：文革武斗有一个特点，它不像过去战争年代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主要是以武力夺取广播宣传站为目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暴力夺取话语霸权。

《出土文物》中记录的“省工人总部”的武斗要求：“不准他（注：指“二七公社”，下同）的大字报上街”，“不准他戴袖章”，“不准他打旗”等，不就是要剥夺我们的出版、结社自由，而我们要保卫的，说到底也就是这些文革式民主权利。这才是文革武斗的实质。

接着往下谈。这时，我厂武装部的杨敬尧带着一二百人来抢我的“尸体”来了。后来知道，当时家里已经几次得到我的“噩耗”，我妈曾昏过去。杨敬尧对

我妈说：伯母，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把小袁的尸体抢回来！他们见我沒有死，一个大块头搬运工小周，一下就把我扛走了。

我们退到了农学院，这里和粮院一样，也是造反派占优势。当时成千上万的人，一个学校就可以养下来。

“7·16战役”，双方力量太悬殊了！如果我们的西郊主力援兵来了，哪怕有几万人就至少可以打个平手，就不会这么惨！被对方绑架走200多人，伤了上千，牺牲了20多个战友啊。“火指”的郑家声身上被捅了几十刀，居然没死！

“二七”胜利后，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专程来郑搞了个“7·16”的记录片，我陪同了他们。郑大附中“红旗”在校园内为其“烈士”、学生张鲁明立了一个纪念碑。而后来的《河南省志·大事记》、《河南省大事记》等官方“权威”志书中竟然对此无一字记载！

八、7·26“烟厂决战”：

“你们打了一场漂亮的淮海战役”

袁：7月22日中午，农学院大门口贴出了当日凌晨江青“要发动群众制止武斗”的讲话，江青说：“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李注：《河南省大事记》P202记载：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北京接见河南赴京谈判各方代表时，做此“文攻武卫”的讲话，次日，“文攻武卫”口号在《文汇报》上公开发表，从此全省武斗急剧升级）。

李：这是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

袁：是我提出来、江青肯定的。她“7.22”讲话中不是说的很清楚么，“河南一个革命组织”就是“二七公社”；再具体点，在“二七公社”内，不就是我“5·31”提出来的？文革二十周年官方出版的由严家其和高皋所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文革三十周年官方出版的由席萱、金春明所著《文化大革命简史》，包括百度百科等，都说是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是“栽赃”嘛！

江青一讲话，包括公社的“策略派”也不敢反对这个口号了。整个“二七公

社”在这个问题上统一了认识，这对以后河南的局势起了关键作用。

武汉发生“7·20”事件后，北京召开百万人大会，全国各地举行游行示威。7月25日，中央电台、报纸报道河南时说：“以‘二七公社’为代表的河南无产阶级革命派，举行声势浩大的万人游行”，这是中央第一次公开表态支持“二七公社”。

从7月26日夜里开始，“二七公社”和“十大总部”在郑州烟厂地区展开了一场“大决战”，据说各有几百卡车人马，加在一起，当时说有一二十万之多。

李：你动辄说那么多人，我觉得，一万多人都黑压压的了，一二十万人，那还了得？

袁：当年的郑州，出动十几万人的事情，我在前面已谈过几起。这次，双方都出动了最大的力量。全国著名的保守派组织武汉“百万雄师”、四川“产业军”也来人参战了。也有人说，在中心地区是“二七公社”五万多人包围了“十大总部”聚集在烟厂内的不到一万人，没有总攻大打，是省军区“支左办公室”的刘生带一个连的部队进去劝降的。

我没有参加这场武斗，公社安排我和范念民（农学院学生，公社常委）等人去飞机场接刘建勋。没接到，凌晨返回市内时，在路上看到很长的满载武斗人员的“二七派”车队，听说是还没有投入战场的预备队。还在手工业大楼看到已缴获对方的枪械。天明后到战场，已经是收尾了，但整个战区，还有零星的战斗。在东面一里外的路上我乘的车熄火，遭到旁边楼上保守派的猛烈袭击，是一队解放军专门来救了我的命！

这场武斗，造反派是“以势压人”。千家万户都知道了中央电台、报纸的表态，保守派失去了他们依赖的组织的“合法性”，所以，军心涣散，不堪一击。可以说，我方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后来，据在京汇报的人员说，周恩来、康生表扬“二七公社”：“你们打了一场漂亮的淮海战役！”

这场武斗后，“十大总部”又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让他们的骨干疏散回农村，准备“农村包围城市”。这就给“二七派”接管大部分基层政权减少了阻力。如果没有这场“决战”和疏散，他们在大多数地区和单位仍是多数派，可以和造反派对峙，可以做有力的反对派。这样，又要发生一些冲突和武斗，还会有更多的伤亡。

李：他们是多数派？你不是说郑州的地盘你们占的到处都是？

袁：那是说老市区居民中造反派是多数，但在大多数工厂，造反派都是少数派。

8月5日，“二七公社”组织了一次武装支援开封“8.24”战友的“东征”。当“二七”战士和开封保守派“左司”、强硬支持保守派的8172部队（陆一军）在开封市中心已交上火时，我们肉联厂参战的车辆按排序才缓慢行进到郑州市的大石桥。也就是说，这支“东征”车队有七八十公里长，其中有7113部队（空运十三师）的战士。不久，随着在开封化肥厂的最顽固保守派据点得到政治解决（空运十三师师长王洪智的功劳），以三大中心城市郑州、洛阳、开封的形势为代表的河南大局已定。尽管有一些地方造反派中两派的小型武斗后来还时有发生，包括8月的大范围抢枪，但都没有影响大局。

9月，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正式传达了毛主席在河南的谈话：“我上次路过河南的时候，看到一条标语：‘大局已定，二七必胜’，河南的形势很好嘛！”应该说，稳定中原对影响全国的局势也是十分重要的。

李：你说“二七”与一军在开封交火，是不是意味着那里发生了“热兵器”武斗？

袁：是发生过零星交火，开了几枪，但因为我不在现场，具体伤亡情况不清楚。开封对立面早就有枪，8月份郑州不是也抢了不少枪吗？

李：抢了多少支枪？

袁：据郑州警备区后来公布，郑州被抢了1.1万支，收回1.3万支，多收回来的的是从外地抢的。比如我们肉联一些人，和九中“8.15”、煤机“东方红”，9月1日从温县武装部抢了一些枪，有几人还受了重伤。尽管他们当时是背着我的，68年8月份，我为此还专门到温县去道歉。

李：抢了这么多枪，是不是有组织的？

袁：郑州最大规模的抢枪，抢的是省军区军械库和独立二师军械库。我们厂也去抢了，我没去。

李：刘建勋在给中央的信中（李注：纪登奎后来加注对此予以认可）说，毛泽东接见他们时有个“发枪武装左派”的最高指示（李注：毛原话：“也不必怕，这边也武装起来。……发了枪可能不打。武装起来，他就不敢动”，“（对武斗）

一反对二不怕”，详见《刘建勋陈舜英画传》，香港中国展望出版社2013年版，P222-223），他们不敢违抗，就商议大学生一般不武斗，因此给郑大和河南医学院各发了一个连的枪，每枪只带两发子弹。这时，“最高指示”也传达下去了，有些青年就不满意：“中央叫发枪，你们为什么不发？”就酝酿抢枪……

袁：“二七派”在二七广场等地刷的标语：“二七战士要武装，不给发就要抢”。当时形势也很紧张，全国保守派又在庐山开了个会，要“农村包围城市”。但是，这一万多支枪散落在全市，却没有发生一起打黑枪、报私仇的现象，这是官方反复审查后证明了的。

李：郑州武斗总共死了多少人？

袁：我和一些人讨论过，郑州武斗，全部（各派）死人不会超过一百人，其中还包括牺牲在新疆哈密、开封等外地的。当时郑大文科楼南面的“二七烈士墓”，有50多座坟墓，文革后被迁走了。

严家其的书（李注：指高皋、严家其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页444）说，烟厂武斗死了十个人。至今，“二七派”的回忆说双方共死了五个人，其中有我们厂一个参加保守派的工人常中一，相当老实的人。我派人将其遗体从烟厂拉回来，然后买棺材安葬。他的家属通过造反派家属组织找到我，说他家困难，我把他的女儿、长子，都安排到我厂就业。文化革命中后期，他儿子常解放一直和我关系很好，至今仍是好朋友。

李：昨天我准备材料时，看到一个人写的《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国亚著，中国广播出版社出版），不知你看过这个材料没有？他说，保守派把造反派包围在一个楼里面，用吊车撞破楼后，投降的人出来一个，用矛扎死一个……

袁：这是指“5.30事件”，我没有在现场。但这次事件中几个死者的“冷冻尸体”事件，却是我经手处理的。“二七”刚胜利，我厂冷库孟库长向我报告说冷库里有省军区送来的五具尸体。我立即报告省革筹、省军区、警备区，头头们都来了。死者的身份很快搞清楚了，其中四个是国棉六厂的造反派：刘新贤、霍克魁、王国英、吴士学，是“5·30事件”后被保守派刑讯拷打致死的；另一个是保守派撞楼的吊车司机，冷库电梯上还留有他的血迹，我们当时认为是保守派杀人灭口。

全国各地的小报都疯传了这条消息，各地来参观的人很多。国务院给我们发

个急电，指出这是国家重点外贸冷库，尸体放在这儿严重影响了外贸声誉。我们就把遗体转移到铁路文化宫，送冰供参观。

李：他们为什么要交给你们冷冻啊？

袁：他们打死后，交给省军区了。这场武斗的指挥，就是军区。为什么全国各地，包括广西、湖南道县，各地保守派镇压、甚至屠杀造反派有恃无恐，因为他们背后站的有军队，后者似乎代表着国家权力。冷冻尸体是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员签字送来的。他们好像当时不好处理，就暂放我们这。

我还想告诉你一点，胜利、夺权后的造反派有过较普遍的报复现象，还有一些人命问题，同样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但是，任延庆和我等“好战分子”，在文革中多次挨整、文革后又被全面清算，我们却没有个人直接或间接的打死人、打伤人、甚至打过人的记录。

李：谢谢您提供的这些宝贵资料。（全文完）

【述 往】

插队的那些事（五）

——第一次回家

朱 特

每当朔风长号，裸露的大地在寒风中变得硬邦邦的时候，知青们就要打点行装，多少带些土默川的土特产回到温暖的家乡。京城虽然已经不再属于从小就在那里长大的知青们，但那里有家的温馨与呵护，是游子魂牵梦萦的故乡。雨村插队的知青就像候鸟一样冬去春来。

来雨村三个月之后，凛冽的北风把大青山吹得瑟瑟发抖，土默川的冬闲时节也开始了。当京城一列列知青专车从北京站开往全国各地的时候，雨村知青却打点行装向家乡而行，他们想回家了。

在京包铁路运行的旅客列车从卓资山钻出崇山峻岭之后，就沿着大青山南麓一路向西而来，在一个叫察素齐小站稍作停留后就又继续西行。小站虽小，但却是这一带的货物集散地，也是我们来去京城的停靠站。它离我们的雨村有40余里。

每年冰封大地的时候，雨村收获的甜菜都要通过大车运送到察素齐，然后再通过火车运往西边的包头糖厂。车倌们很辛苦，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要出车送货，当天返回雨村再装车，第二天还是同一时间出发，这样的工作要延续到春节前后。这就给知青回京城带来些许便利，可以搭他们的便车使40余里的路程不必太艰辛。

一共是六条汉子，除了我以外还有三哥、叶公、阿生、二子、寿兄。别的兄弟已经先行回家。女同胞自有行动计划，是不和男知青们联合行动的。那时大串联的遗风犹在，知青之间常常传递着扒火车回家的消息。在出发前我向几位老高三建议扒车回北京，这些曾不知顽主为何意的书呆子们被我说动，觉得可以一试。

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我们就随着运送甜菜的大车出发了，这是个有着4辆

三驾马车的车队，行走黑黢黢的田野上。拉车的马走在熟悉的路上，并不需要车倌们的过多的吆喝，在寒夜里只有马脖子上的铃铛发出清脆的声音。我穿上所有能穿上的衣服依然觉得寒冷浸骨，呼出的哈气在帽檐上衣领上甚至眉毛上结成白霜。就连铃铛声似乎都被冻成一根棍子，把耳朵敲打得生疼。内蒙古高原上的冬天第一次向我们展示了它的威力。聪明的车倌在大车上燃起一盆炭火，大家可以轮流在车上烤火，我却觉得也不济什么事，只是心理安慰罢了。一个车队就是一串跳动的火焰，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分外显眼。在空旷的田野中不时能看到远远的地方也有一串火光在蠕动，就知道那也是送甜菜的车队。黑暗中的土默川平原似乎也有一种美存在着，但那时的我不懂得更没有心情体会，只是急切地盼着天亮盼着能带来温暖的阳光。

走到车站大约是10来点钟的光景。

小站上停着一辆东去的空货车，我向哥几个提出就是它了，大伙点头称是，于是我们找了一节看上去还算干净的空闷罐车厢。当我们把随身携带的行李向车厢里搬运的时候，车站上来来往往的人们似乎像没看见一样，没有一个人过问。在我们一路东行的路上，这趟车经过大大小小的许多车站，也从来没有人对我们进行干涉，看来这种事情实在是稀松平常司空见惯了。

上车不久货车起动，我们都很高兴，我觉得这是为我们准备的专列。但这趟车就像没有人管一样，想停就停想走就走，停的比走的时间还长。从察素齐到呼和不过区区50余公里，它竟然磨磨蹭蹭地走了四五个小时，让我们最初的兴奋变得有点急，骂铁路局的调度不是个东西。

当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的专列刚刚进入大山里面就又停了。这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左边是山，右边还是山。山里的风更硬，我们都觉得冷。我想起大车上的那盆炭火，就又出了个主意捡点路边的枯树枝子烤火。我和另外两个哥们跳下专列手忙脚乱地划拉了些干树枝子扔进车厢，又赶紧回到车上。我们不知道这个家伙什么时候起动，它跑起来我们可追不上。

红红的火苗升腾起来后，车厢里似乎有了暖意，我们围着火堆转圈跺脚抽烟唱歌，有了火生命也就有了活力。专列悄悄地动弹了，它挪动一步我们离家就近一步。这时一个哥们突然想起了什么，问了一句：这车厢的地板是什么做的？我揣测地回答：应该是铁的吧。另一个哥们用脚把火堆向旁边挪了挪，天！木制

地板已经红了像猴屁股大的一块！我的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专列已经加速，火借风势要着起来怎么办？几个人赶紧把火堆踩灭，但地板还是红红的一块，这可如何是好？火一旦着起来我们不是被烧死就是被摔死，小命完了不说还要背上个破坏国家财产的罪名。我急中生智喊一声快尿尿，说着就率先行动。毕竟人多力量大，地板终于由红转黑，随着专列的飞驰我们也长长地出了口气，这时谁也感觉不到冷了。

我们成功地防止了一场列车大火之后，夜幕就把大地笼罩了。冬天黑得早，山谷里的黑夜来得更早。我们无灯无亮的专列在像蛇一样在大山里钻来钻去，一段时间后停在一个灯火通明的车站，下车一问是集宁。经过了一天的折腾，又冷又后怕的我们再也不准备冒险了，大伙决定结束专列乘坐，在集宁站等下一趟绿皮车回家。

下了专列我们终于吃上一顿热乎乎的晚餐。在乱哄哄的候车室里，六条汉子商量的下一步计划是：买一站地的车票混上绿皮车。我们的目的就是先上车为原则。一个多小时后，绿皮车来了。车上的人还不像一两年后那样人满为患，虽是过路车居然还有不少空座位，六个雨村知青四散开来各自找座位坐下，开始了回家的最后一程。

从专列到了绿皮车仿佛是从地狱到了天堂，不仅温暖还有热水喝！离村时穿的衣服一件件脱下来打成行李包。回家的感觉真好。车上有不少回家的北京知青，我遇见了在恼木汗插队的哥们，他很惊异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上车，我做简短说明，他好像有点不明白的样子，但也未做更深入地询问便聊起了天。

列车就像一个巨大的摇篮，把人摇得昏昏沉沉，经过一天的劳累，我更是睡意浓浓。在昏睡中只听得列车员报过丰镇报过大同，朦朦胧胧中只觉得离家越来越近了。

朦胧中感觉列车在减速，耳边又响起列车员的声音：张家口到了，下车的旅客做好准备，不下车的旅客拿出车票，我们开始查票。列车员的喊话犹如一道霹雳，立刻驱散了我的睡意，让我头皮发紧。张家口是列车到京城前的最后一个大站，从这里到京城只有四五个小时的路程，此时查票让我恨恨，但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我紧张地站起来张望我的同伴，希望和他们会合一处相机行事。但没有看到

他们却看到车厢的两头都有三四个戴红箍的军人和列车员。他们从两头向中间推进，凡是经过他们身边的人都要接受检查。那阵势如铁桶一般，若想混过去除非变成隐身人。已经有我的同道被军人押下了列车。

终于轮到了我。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战士看到我的车票，严肃地说，你开什么玩笑，你的车票早就过站了。我还没有到家呢，我说。他问：能不能补票？没钱，我又说。那你下车！解放军战士下了命令。

这时在旁边一直没有说话的列车员突然说道，拿好你的东西，跟我下车。没有办法，只好拿起行李随着他向车厢门口走去。是北京知青吧？他问。我回答，他又问在哪里插队，我告诉了他。一问一答已经到了两节车厢的交接处，他向后面看了一眼，把我推向列车的储煤仓。他拿出一串钥匙打开小铁门，我向里一看，呀，里面敢情早有了一位。列车员低声对我说，快进去，开车后我再来。

储煤仓里的那位果然也是北京知青，在更遥远的地方插队。他悄声告诉我，早听说京包线上有位秦姓列车员对北京知青特仗义，没准这位就是呢。我听了挺感激这位其貌不扬的列车员。听着外面乱哄哄的声音担心着同伴的命运。

也许为了彻底清查无票人员，绿皮车在张家口车站停了好长时间。当我重新回到车厢时，看到车厢里的空座位更多了。我无心找座，先看看我的同伴怎样了。穿过一节车厢后找到了雨村同伴，大有劫后重生一般。我们把各自的情况都说了一下，结果是：除我之处还有叶公和二子在列车员的帮助下成功逃票，我的发小阿生被严格执法的解放军战士押解下车，下落不明，让哥几个替他担心。三哥和寿兄不想再找麻烦，在车上补了票。

车窗外已经露出冬日的晨曦，缓缓而过的小村落还沉睡在冬天寒冷的早晨里。望着车外的萧瑟冬景我毫无睡意，虽逃票成功但心里并不踏实，只有出了北京站此次旅行才可说圆满结束。

列车到南口时我和叶公二子下了车。南口是这趟列车到北京站前的最后一个停靠站，从这里到北京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了。我们这在这里下车以为这里是个小站，管理会松懈一些，好蒙混过关，然后再乘坐市郊车回家。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随着列车的开走，刚才还挺热闹的站台突然之间就剩下我们三个孤零零的身影，就如同大潮退去后的裸泳者无遮无拦地暴露无遗，显得格外扎眼。我们想尽快脱离这不尴不尬的境地，便沿着铁轨一路走下去，结果撞

到了车站值班人员的枪口上。

两位值班的大老爷们把我们带进办公室，查验了我们只有一站地的车票，问我们在哪里插队，说那地方不是很穷，不至于买不起一张车票吧。我们还没分红呢，没钱买票。这是我们的回答，反正事已至此爱谁谁了！

审了一通后，问，你们身上还有多少钱？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钱数了数有3元多，叶公和二子也掏了点零钱大约也有两三元。那两人把毛票还给了我们，又给了每人一元的整票。其中一个人指着桌子上的钱说，这些钱给你们补一张车票。给你们的钱呢是你们回城的路费。还告诉我们半个小时后有一趟去西直门的市郊车。

中午我和二子回到了大槐树下。

发小阿生当天下午也回到了家。他说，在张家口站被集中起来的无票人员有几百人之多（大约是多趟列车积攒下来的），多是各地的知青，有北京的天津的上海的还有南京的。这些知青都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文革小闯将，聚集到了一起有叫的有喊的有哭的也有唱的，那叫一个热闹。站方为每个人作了登记然后按每个人所说的到达站发了一张车票打发回家。我直后悔：不如在张家口下车呢。（未完待续）

【述 往】

安希孟回忆录(四)

——我的大学

安希孟

1965年溽暑难熬的一天，父亲去翼城县城买小猪，碰见王老师，得知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据说王老师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让孩子上学。他一定是看到父亲面有难色。我扛着锄头从田间归来，心中仿佛揣着小兔。也许心灵感应，觉着家里发生了什么。耳红心跳地一进门，嫂子的喜悦脸神仿佛传递信息——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一个农家子弟寒窗十二年，所期待的莫过于此。

大学迎新，接待我的是李甘霖大哥。北师大东门一进去，细密的铁网上大幅标语：“欢迎您，未来的中学教师”。我一下子心里就凉了半截——和我同感的，应该说不在少数。“欢迎您，未来的人民教师”不也挺好吗？为嘛就把前程定格得如此彻底呢？

从北师大校门口到西北楼，我至少问了两次“到了没有”——好大的校园呀。我住在西北楼四层，给伯父写信特别指明是四层，有点炫耀的意思。可伯父担心：四层，这么高哇，我的娃爬得上去吗？可我觉得住在三层还不过瘾。厕所和水房是水磨石墙面和地砖，比周围高校学生宿舍宽敞靓丽。这也是我心中暗自高兴的原因。高中的同学来北师大要是从校门走半天走累了才能来到西北楼，我就高兴。北师大水房两个管道，晚间和早晨有热水。工友打扫卫生。每天上午，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从门底下投进来。听说大学毕业就是22级干部待遇，甭提心里多爽了。广播喇叭早晚两次广播，早晨就可以知道人民日报新闻。西北楼前枣树林下，男同学聆听广播聚精会神。那个北师大主楼，八层，得仰视，觉得在晃动，她也许就是北京市最高建筑之一——低于邮电大楼、军博。每次从底下经过，仰视，都有些儿眩晕。等到八十年代回校，再一看，周围的水泥丛林中，她只是众芳国里小花了。

北师大那个图书馆应该就全国高校之冠，高耸入云，造型优雅，典籍充栋。人们爱说自己学校的图书馆是全国几大图书馆之一。师大穷学生在这里吮吸知识

的乳汁。北师大天文系为全国高校绝无仅有（另一所在南京大学）。两座高倍天文望远镜格外醒目。北师大有绿园一处，主楼前阔大的广场硕果满枝，桃李满天下。东西操场两个。

我们的校长陈垣可谓国宝级大师，颇得毛泽东器重。北京的大学生都知道北师大校长名气大。老校长陈垣孑然一身，没有成群结队的扈从仪仗，正气满腔书生本色，甘坐冷板凳，不组建自己门派帮会。师大历史系所谓“五世同堂”也者，是人们夸赞历史系学人辈出，代不乏人。他不是掌门人，不是山大王，不排座次权倾一时。他不在他入文章著作上署名，不滥竽充数。他也不主编论文集。他没有独占国家项目，买版面发文章，连篇累牍，师徒联署，汗牛充栋。他也不自立门户，自封学派，急功近利。我们系有朱德的女儿朱敏，钱钟书的女儿钱媛，著名戏剧家洪琛的女儿洪钢，著名十叶派诗人郑敏。那个郑儒箴教授，据说是周总理钦定的毛选翻译者之一。中文系的闻蕙老师是闻一多的女儿。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是北师大党委委员。罗隆基的夫人浦熙修，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还有个叫浦洁修，据说是左中右三派。党委副书记马建民的妻子是著名作家杨沫，马建民是《青春之歌》中的革命者。57年著名右派六教授，北师大占了2位（黄药眠、陶大镛），我们反而高兴，你说这是什么心态？

开学典礼时，全系老师一千人马鱼贯而进，进入文史楼108教室。外语系老师，特别是女教师，裙裾飘然，烫发卷曲，仪态端庄，风姿绰约。我们大一英语教师刘宝英，年轻时是靓女，一头烫发大波浪，印尼归国华侨，华东师大毕业。另一位是陈达星，也是华侨。我们觉着华侨呀，外语一定镞儿棒。为了创造外语气氛，陈老师和我们一起在学生食堂，就在如今风光不再的西饭厅就餐。好吃（delicious \ 面条（noodle）馒头（steamed bread）我吃饱了（I'm stuffed），就是在西饭厅（dinning hall）里和陈老师学的。那时觉着前途无量，不至于到中学吸粉笔末。

北师大多收贫寒子弟，冬日霜晨操场多赤膊上阵光膀子的赤脚大仙。那不是为着风流，而是贫寒。南方学子初入学一床被子，铺一半，盖一半。但师大学生孜孜苦读，亦能在全中国折桂夺冠！在这里，贫穷不受歧视，奢华反遭诟病。虚心学习是高尚，好问穷究不为耻。北师大吃饭管饱，米饭一份，起初馒头随便拿，都是切割成一半。我和隗仁莲同学上大学进校门时穿的衣服，半年后忽然小得不

能穿。小棉袄勉强遮挡住肚脐。高中毕业照，我是小个子。后来见到高中同班同学，发觉他们并非人高马大，才恍然知晓自己上大学长了知识，高了觉悟，也蹿了个头。隗仁莲因为是丑小鸭在教室前排中央就座，学习也刻苦。那个农村娃饱尝过饥饿的味道，到北师大忽然知道世界上居然还有可以吃饱饭的营生。拙荆隗仁莲来自河南，据她说，上大学前没见过粮票。第一次坐火车，没有座位，还乐呵呵的，站在列车窗口视察窗外景象，还觉得挺风光的。她后来也成了翼城南常村人，这是后续话题了。

大一时外语系领导是叶英、关山、杨迈、刘玲梅、田瑞厚老师。团总支是杨金英老师。杨老师个子娇小，在教会孤儿院呆过。我们以为是教会从良民手中掠夺健康的儿童摧残。后来知道，国人遗弃在先。现在要是如此慈善机构，就善哉善哉了。我好像觉着教堂也是积善堂啊。辅导员杨芝岭。赵太和老师是我的山西老乡，晋东南人。一年级一二班同学中学学的是俄语，三四班同学中学学英语。

大一时印象深刻的，是谢芳春书记的报告批判“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诗句，第一次听到这美轮美奂的诗句，心中窃喜，仿佛觉得自己就是登了天子堂。“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些诗句，也是在谢书记批判中学到的。中文系的曹述敬老师讲授吴伯萧的《记一辆纺车》中引文“沙场秋点兵”，记忆深刻。程今吾校长要求文科学生大一开设中文和写作课，在我是求之不得如鱼饮水的。

我来自晋南农村，基础教育相当薄弱，学英语是大笨伯，但我不藏拙，不遮丑，不虚伪，不矫情。不懂就不懂，朱其英同学就是我的老师。有几个音素我发不好，就颀颜请教朱其英。人家不厌其烦，我倒烦了。入学第一个寒假，张广慧问我假期干什么，我虚伪地说准备学毛选某篇某篇。张广慧说，我问你英语准备学什么？我忽为自己矫情虚伪觉羞愧赧颜。如果不是动乱岁月，我们会沿着知识大道各奔前程。

大一入学军训和后来的战备演习，就是防止苏修入侵。丁正常装扮苏修美蒋特务被抓获。一个月的军训结束，在东操场汇报表演，布置的民房窗户门窗处处是地雷，“鬼子”迎面倒毙，血肉横飞。我打靶得了优秀，九环，陈达星老师帮我用英语向老家的弟弟报喜。丁正常还会握着篮子唱“花篮的花儿香”。北师大在临汾牙儿沟搞农场半工半读，躲避苏修空袭，大家很兴奋，只有我闷闷不乐。我想不远万里来到北京，好不容易登上天子堂，怎么忽然又回本乡去当田舍郎

呢？这不是走回头路吗？况且，劳动呀，我从小就干活，还能有什么资产阶级思想。再说，资产阶级也不允许我加入他们的团伙呀。

在师大过第一个国庆节和元旦，领略了火树银花不夜天的风景。国庆板报诗文璀璨、各呈异彩。我有些儿自惭形秽。和这些各地来的高材生相比，我的文学知识和写作水平可相形见绌了。几乎所有的同学在原来的中学都是出类拔萃之辈。

大一时教室有一块小黑板，我为入团，积极表现，便抄毛主席语录。晚上自习结束拿墩布擦楼道。大一时，我好几次半夜感冒，韩佳升同学送我到校医院。第一学期，女同学向雷锋哥哥学习，张广慧等为我拆洗被子。有一次常新华同学在校报的文章里有一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就很羡慕她的文才。北师大印制的元旦贺年卡十种，集北师大景点之特异者，我们纷纷购买邮寄给原来的中学，颇带点炫耀的意思。

1966年一月参加京密引水工程劳动，住农大。京密引水工地，我们没露宿，但分明风餐。我每早与张广慧先到御膳房用早膳，提前到工地领洋镐、平车、铁锹，下午收工清点璧还。我和李招英组合拉车。她这个南方女子和北方人一样憨厚朴实勤劳。我因为表现积极，劳动总结时受到团支部常新华单独特殊表扬（因我正申请入团。不过因为文革，我一直到退休，仍是团外无党派人士）。

大学时代经济短缺，一双塑料凉鞋赤脚穿，从五一穿到十一，一件背心无可替换。六九国庆天安门游玩跳忠字舞，叶英老师替大伙看管衣服，我仅有的一件制服丢失，叶英把自家老公副部级四兜中山装给我，算赔付。我穿了好几年干部服。我从大一（除免费伙食外）每月领取三元助学金，比别的穷孩子多一元。南方来的同学没有褥子，被子是铺一半盖一半，得着补助，才有了完整的铺盖。

有一次广播里哀乐低回，北师大化学系鲁宝重教授去世。他著有《酶学概论》。我们知道这一定是重量级人物。当然寒风苦雨中还肃静聆听高音喇叭里的焦裕禄事迹，暗自思忖，焦裕禄是榜样，可兰考到底改变了旧模样没有呢？不过这话得烂在肚子里，打死我也不敢说出来。

我并非异禀之人。我的智商天赋略低于同龄。刻苦嗜读也许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初到北京还问街道上白线是干什么的。我和大学同学，论知识学问阅读见闻并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少时劳作占据了生活的大部。从父母继承的只有憨厚勤奋

俯读仰思。见“不日”“凌晨”“沪”也要问何意，以至被揶揄。我很长时间写“修”字，少写中间一竖。开展的“展”字，我下面写作衣服的“衣”。陈毅的毅，其中那个豕，我一直少写右边一撇一捺。焦裕禄得的是癌症，癌，我读作shan，与疝气混淆。大学翻烂了几本《新华字典》，方弥补中小学基础教育之不牢。刘来牛有一本张际春的《简明英汉词典》，就比我们掌握先机。后来我翻烂英语字典，路上请教英语句子，也习以为常。毕业后一位好友从本单位偷了一本郑易里《英华大词典》给我，算是厚礼，那是我的伴侣。最大优点是逛书肆。系里班级报纸上样板戏评论文章被我据为私有，黏贴成册，红蓝笔勾画，采撷嘉言懿辞，别人也翻看。大一时开饭前在北师大书亭看柏拉图的《理想国》，大概0.90元，自然不敢问津。大字报区踟躅留连也是为要学习华章篇什。游故宫或颐和园长廊也采撷骈辞偶句。坐公交车也要携带书报。

文革来啦。何明、高炬的文章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高亢有力地广播，在我们心中激起涟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社论写得何等好哇！我们热血沸腾了。誓死保卫毛主席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我们为能参加这场斗争而欣喜若狂，这比念书要重要。人民日报笔杆子们引用的马克思一句话：“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殊为精彩，我琢磨了几年，也未必探骊得珠。不过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的确出笼了，比如我就特别仇恨我们大队书记，所以他倒霉，我高兴。文革伊始，北京市委改组，李雪峰、吴德取代彭真、万里。六月一日，谭厚兰、刘兴隆自《红旗》实习回校，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揭发程今吾（延安时期延安小学校长，老资格教育家）。一石激起千层浪。我的英文老师以1957年为鉴，拘谨观风。我虽不辨风向，但情知此一时彼一时也，至少知道娃娃们这次不会担心被打成右派。不料6月20日，数学系一同学把火烧向工作组组长孙友渔（七机部副部长）和“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惹下大祸。运动纳入正规，一批右派游鱼被揪出（68年又揪出变色龙小爬虫）。直到7月27日，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才翻身得解放。毛主席回来了，这才抬头望见北斗星，黑夜里想你方向明！辅导员杨芝岭的得意门生开始反戈一击批斗她，有人在地上画一美女蛇，让她站在蛇头圆圈内。呵呵，原来我们尊崇的老师还是美女！有些在政治上不甘寂寞者始终走在前列。我后来在校园见到杨老师总想打招呼，

但她有意回避。我想大声说，斗你的人中间可没有我呀。青年人政治嗅觉灵敏，热情高涨，反修防修意识极强，爱咱们伟大的党呀，可以赴汤蹈火。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就人头落地，所以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文革伊始，文史楼 108 教室里的斯大林同志肖像不翼而飞，那是被一阵浩荡东风吹拂而去的。刘树林同学有政治眼光，认为是旧系总支配合苏修否定斯大林。工作组进驻北师大，我们欢呼毛主席派来的人，未几，工作组孙友渔开始抓游鱼。有一天，文史楼 108 教室沸反盈天，外语系高年级学生党员自发组织起来，回光返照，替旧系总支打抱不平报仇雪恨，抓假“左”派、真右派和反动学生。主持会议的高年级党员干部据说患病，腹部抵住桌子一角，仍坚守战斗。几个出身不好平日思想落后的同学成了牺牲。有一条游鱼被先锋队党员干部斗，从西北楼 4 楼纵身一跃。后来多亏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点明这是转移斗争大方向的资反路线。我在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取中间立场，但我尤其厌恶、憎恨、恐惧把自己的伙伴同窗打成假“左”真右的党员“红五类”们。后来的红卫兵，多为出身好的进步分子，搞血统论，也大骂“狗崽子”。我们这些可爱的孩子们，文革后期，也就是“秋后”，遭遇清算。那是过河拆桥。谭厚兰、李五全、王颂平、李先华、蒯大富等等学生领袖，命运多舛。他们不是浪漫的弄潮儿，而是被“潮弄”、被裹挟、被蒙蔽、被利用。

一九六六年 7 月 27 日傍晚，晚霞满天，突然闻听“毛主席万岁”声巨浪排空，师生热泪盈眶者大有人在。陈伯达、江青、康生来到师大校园。自然还有王关戚、穆欣。大概后来陶铸、王任重也来了，不过坐在边上，也没有人介绍，现在看来是被冷落的。女大学生王岚风姿绰约，口才极佳，怒斥工作组长刘卓甫（原物价局长）执行的是“没有孙友渔（七机部副部长，原工作组长）的孙友渔路线”，妙句隽语，令人想到“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赢得掌声与喝采。当时工作组说谭厚兰的后台是《红旗》杂志林杰，康生说，林杰是你们北师大的好学生。我顿时觉得脸上有光彩。年轻人嘛，谁无虚荣心呢！这次的首长讲话被传抄全国，北师大谭厚兰因而成为四大学生领袖之一。谭厚兰后来死于癌症。娃娃们成为政治斗争牺牲品，其实无辜，值得同情。这位学生领袖一直和我们一道在北饭厅用膳。毛主席戏称她“女皇”。个子娇小，一点也不凶神恶煞啊。

师大的风云人物，那时候还有陈兰彬、郑云云、李春秋、王颂平、李先华、蒲寿章（外号普鲁东）、武汉。谭力夫鼓吹血统论，我当然反感。二附中的小闯将们有一次闯进北师大广播站大闹，对空喊话，大骂狗崽子。不过我现在觉着文化传承，还真有血统血缘因素。血统论盛行时，“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骂，骂，骂，骂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世界”。我们的女同学也张口闭口“他妈的”。国骂盛行，就是爱国。头扎小辫，腰扎皮带，女子穿短裤，就是那时的时髦装束。有一次我在英二同学的《红楼梦》上书写“黄色书刊”，弄得大家不愉快。因为我想，谈情说爱与“三分之二”无缘。要武，不爱红装爱武装，是理想。

李春秋的大字报一石激起千层浪：“拥护还是反对谭厚兰等革命左派是真假革命的分水岭”。这题目多吓人。后来的“红梭镖”就以这批老师为班底。我个人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站在少数派一边。不过在当时反对工作组，为被打成“游鱼”的学生平反，才真的算是革命呀。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应该说点过头话，才能吸引眼球。

有一件事值得回忆：我们外语系的孙文博大姐，革命干部家庭出身，属于红五类，筹委会主任，红卫兵师长（后来被叫做伪红卫兵师），因为北师大是师级单位。有一次大会她朗朗上口：“被敌人反对是坏事而不是好事！”引起一片嘘声。还有一次，32111钻井队作报告，她说：“给英雄的32111钻井队献花圈”。她的名言：“毛主席为我们亲笔题写‘北京师范大学’金光闪闪八个大字”。我掰着指头一算，明明只有六个字呀。你想，这分明是紧张所致，不是她算术不行。

文化革命中外语系批斗黎浩智老师，大字报罗列罪状之一是他们哥仨叫黎浩智、黎浩仁、黎浩勇，和蒋介石的智(wisdom)、仁(benevolence)、勇(courageous)符合。西北楼内有人骂董辉是狗崽子(puppy)，董辉机智地说，他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对方说，你也配做劳动人民的儿子？他说，“陈伯达同志说，我们都是(We are all)劳动人民的儿子”。董辉后来在四川攀枝花某中学反对四人帮被打成反革命；四人帮倒台，他又被说成和四人帮有牵连，仍不得翻身。80年我到南京大学深造，和他有过通信，他用文言体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很有水平，不愧是师大才子。高年级还有几位朋友叫刘家钊、李庆云（后来北大经济系研究生留校）、陆家贵、袁道之。袁道之，才人也，俄语系的，可后来却上了中科院

英语研究生班，足见他的才情出众。李保全，更名李革，革命的革。

理科一位汤姓同学遭遇人格侮辱，被骂作是“汤二麻子”。他出身不好，自我革命改名为毛为民，但同班级同学说：“你也配姓毛？！”不让他革命。姓毛，就立地成了红五类，而且是最最最红五类。物理系邢保林，父为陕师大右派，文革造反动路线的反，更名为党红兵，成了党的人。我们后来一同发配到宁夏。在开往塞外的列车上，我起先觉得自己很优越，和那些有政治问题的人不是一个档次，不愿意理他，但到得银川，就成了朋友。邢宝林的女友李东平出身好，父母坚决反对她嫁给右派的儿子。“四人帮”倒台，翁婿才和解。

1966年8月一夜，北师大二附中红卫兵用皮带抽打老师，女孩子失去了应有的羞涩、矜持和文静，惨烈的哀嚎声从被厚布蒙蔽窗户的教室传出，耳不忍闻。北师大死于非命的有著名马克思主义逻辑学家马特、物理学家祁开智。我们系的教授何万福、胡明跳楼毙命。学生中纵身一跃者亦不在少数。始料不及的是，部分高干子弟成立了“首都中学生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反中央文革。那年冬天的一个寒夜，我们奉命到北京站搜捕欲逃离京都南下的“联动分子”。

在北师大和敌对势力阶级敌人苏修特务作斗争捍卫国家安全，人人有分。洪钢老师在苏联留学，留学生们在莫斯科也闹文化革命，上街闹事，和苏联当局发生冲突，成了光荣“反修战士”。新华社图片用词是“军警如林”“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戒备森严”“色厉内荏”。后来文革被定性为“十年浩劫”“十年动乱”，动乱到别国，这其中的是非应该清楚：在咱们这儿叫动乱，在人家家家里也应该是动乱。洪钢老师回来后就成了凡人，反修红花也不常戴在胸前。

李乃清老师文革刚开始就结束英伦三岛留学生活，回国积极投身于革命洪流。因娶洋太太而出入过苏联使馆得接受隔离审查的耿志国，被疑为特嫌。他海外老婆的信先得接受工军宣队审查。私人信件可以拆阅审查，是时代特色。领导要耿志国交代里通外国问题，他说狼要吃小羊总能找到理由借口。我们就说你污蔑革命群众是狼。革命群众说你是特务，你不承认，那岂不是说革命群众冤枉好人？革命群众还有错误？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难道还能冤枉好人？革命群众说你是特务，你就应该是特务，必须的，不当特务也不行。你的任务就是敌视推翻咱们的国家咱们的党。就算冤枉你了，你也应该成全我们，主动当一次特务好了。

（未完待续）

【简 讯】

香港中大召开“编写《广州文革史》座谈会”

阿 陀

2014年11月4日下午，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会议厅，由香港知青协会、老三届文史研究（筹备）会和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的民间历史学者阿陀联合举办了一场“编写《广州文革史》座谈会”。出席者除了原广州十所中学的十多位文革亲历者，还包括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正在该中心做研究的内地学者、中心原任和现任两位主任以及其他关心人士等，共二十七人。

会议主持人阿陀表示，后年，2016年将是文革五十周年，全国各地都有人开始在做分省市的地方文革史。我们广州地区自七十年代以来，境外境内，形形色色的文革史已经出了不下十本，虽然大部分都以个人经历为主，也没有一本是比较完整翔实正规出版的，但都非常有价值。在这个基础上准备编写的这一部《广州地区文革史》，史料应该更全面，视点应该更高瞻，叙述应该更客观。初步计划分为三个部分：大事记、文集和述评，希望在座的朋友提出意见和建议，最好还能参与分担编写工作。

与会者发言踊跃，文革经历者都表示这项工作非常有意义，愿意尽其所能搜集提供材料协助大事记和文集的编写。学者则就如何利用档案和口述历史材料各抒己见。大家的共识认为，这是一个太庞大的计划，以一人之力在一两年内完成几不可能，因此建议先易后难，首先把“大事记”这个架子搭起来，以后还可以陆续往上面填补内容。会场上发言的不仅仅是40后50后，也有好几位70后和80后。年轻一代对这项抢救历史的工作表现出一种少有的热情，让大家看到希望。最后，“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前主任熊景明感慨地表示：

首先，我在中心三四十年来我从来没有看见这样的盛况。这个房间里举行过无数的研讨会，也有无数关于文革的研讨会，但这是唯一一次，一群人走到这里来说，我们不只是为了研究，而是显示出我们对文革、对历史的承担！我最近看

到野夫的一句话：我们对抗专制，手中唯一的武器是我们的记忆。

我这个夏天在昆明也是走访了我们很多在写回忆录的人。我们要找回历史的真相，是因为只有找回历史的真相，才能找回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也就是说，过去的历史是一道光，没有历史的光，我们的未来就是一团黑暗。这些简单的道理都在我们心里面。我今天就简单地向大家表达我的敬意。我们云南人看到你们广州人自愧不如，因为我们也联系了云南的人，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写一个云南的文革史？找来找去就找到三四个人，然后其中一个红卫兵的造反派就把他写的回忆录寄给我，我看完第一章就不要看了——第一章题目是“跟随毛主席干革命！”就是他根本还没有从那个梦中醒过来。这里我想做一个广告，来讲讲我们中心有一个“民间历史”栏目，主要作用就是收集民间的写作和回忆。因此我们搭建了一个“民间历史”网站平台 <http://mjlsh.usc.cuhk.edu.hk>，希望很多你们写的东西能放到我们网站上。

我也经常会说一句话，我们在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彼此不道谢，因为在拉同一艘船的纤夫，他们不会彼此谢谢。

出席者：

罗 钧（原广州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招小波（原广州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黎服兵（原广州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余汝信（原广州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何仰捷（原广州一中）

刘天麟（原广州六中）

梁信礼（原广州六中）

骆少伟（原广州七中）

谭加洛（原广州八中）

黄东汉（原广州十四中）

周继能（原广州十七中）

伍世扬（原广州二十八中）

张震宇（原广州三十三中）

金 虹（原南京师院附中）

列 孚（香港艺评家）

袁梦倩（香港中文大学 博士生）

白 磊（陕西、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

周建渝（香港中文大学学者）

黄永年（香港中文大学学者）

陈 磊（上海社科院学者）

沈 洪（腾讯网）

熊景明（香港中文大学学者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高 琦（香港中文大学学者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广州文革史”编写计划（征求意见）

第一部分：大事记（2015年上半年完成）

第二部分：文集（2015年上半年完成）

第三部分：述评（2015年年底完成）

【资 料】

关于右派分子戴煌的材料（三）

——1962年戴煌的十万言书

新华社党委办公室印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

五、被改造者内部的斗争

五九年三月中旬，雪融路湿，运木被迫停止，原来在哪个队的右派仍回哪个队去。由于畜牧二队计划与第一生产队合并，我们这个排就到了一队。当时的排长是徐培基，副排长为梁文华，我所在的那个班的班长为焦勇夫。

在一队工作了两个多月，五月底到三队去点播大豆；六月初，原是打草队的人又回畜牧队去打草，直到五九年国庆节。

在这边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对农场的工作产生了许多意见；对我们国家的形势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但是，和领导方面没有再发生正面的冲突，上述意见与看法多半是在背后议论的，在交心会和政风会上也提出过。使我最伤脑筋的还是右派分子内部的勾心斗角的局面。

在交代这个情况之前，我觉得应该先谈谈生产队的情况。

生产一队的干部与职工起先对我们是很好的，他们基本上执行了党的政策：生活上，一视同仁；劳动上，绝不超过十二小时，学习方面，也执行了上级党的指示，凡是党规定我们能听的报告——如郑州会议的精神——都给我们传达了。尤其值得我敬佩的（是）他们的工作很有计划性，干部群众能打成一片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全队所有的干部，对每一块地都很熟悉，工作起来按部就班，踏踏实实，有时突击，场部规定早晨两点上工，队干部按时起来后，见外面黑乎乎的，下了地也只能坐下来抽烟，他们遂在钟台下面等到东方微白，才打钟叫大家起床。由于他们工作得很好，所以生产和生活也就搞得很好，食堂里挂满了上至农垦局，下至云山本场的评比奖旗与奖状。我们排过去得到的一些红旗，也被队部要去挂

在食堂里，把我们当作他们队里的一部分，表示亲密无间；并且发动我们搞文娱活动，和队里的青年男女合组成歌队，经常开文娱晚会，大家的精神挺愉快。有一次出去救火，夜里回来时，我们的女同志掉了队，队部特地派马车到半路上去接她们。当然，事物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一队有时也有使人不够满意的地方，比如在假日中或下工后，所有职工都休息了，唯独派我们修栅栏或平球场等等。想想人家好的地方，对这点不愉快的事就很自然地给予原谅了。

在一队的时候，我除了在国家形势方面发表过一些意见外，和领导方面的关系是比较正常的。劳动、生活、学习，一如既往；几次扑灭山火，我都表现得很勇敢，发稍和眉毛都被烤焦过。拉爬犁被压伤的左小腿，这时疼得相当厉害：走时疼，站时疼，躺在床上也疼。医生给我针灸，一拔针，冒出一股污血。我没有因此要求休息一个小时。

问题往往出在我们被改造者的内部。我们有许多人不仅要记自己的好，夸大自己的好，并且还要打击别人来突出自己的好。焦勇夫、辛若平等人就是这样的，而他们对我又有成见，我就尤加受苦了。比如说，我救火很勇敢，场部也要求各队特别重视这方面的表现，但是在我们班内部提名表扬时，就没有我，每次都是别的两个班提出来，排里才表扬我的。可是，如果我说话不注意，或挖苦了谁一下，他们马上就如获至宝，立即汇报。甚至在讨论西藏事件的时候，他们把我的正确的发言也给歪曲成不正确的了。像云山各队的领导一样，一队的领导也有这样的缺点：凡事都是听班排长的，从不到群众中调查研究，听听不同的反映。我想，这样下去不得了，日子一长，我的档案袋内将会装满无数的“没头案子”，我跳下黄河洗不清。我也搞过一年多的“肃反”工作，曾经为这一句话、那一句话，这张小条条、那小张卡片伤透了脑筋，国家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如调查费用等），结果也查不出啥名堂来。我到北大荒后才理解到，这种混乱的现象大概就被不负责任的、甚至是断章取义、歪曲捏造的无数“小报告”造成的。我应该设法制止这种现象的滋长。

有一天，我和焦勇夫又发生了一次争执，晚上开班务会时，他威胁我说：“你要老实点，反对放卫星的事还没有了结，你应该把书面材料写出来交给组织。”我一听，非常气愤，觉得他变得越来越坏了。此人很聪明，读过不少书，口才文采都不错。到北大荒的初期他也是比较明智的，能够从多方面看人，也能体谅人。

后来他大概发现不实行“踩人”的政策就摘不了帽子，遂慢慢变得没有良心了。在水渠上，他昧着良心对我进行批判，我原谅了他，现在他竟想再次压制我，可是他本人呢，却有过无数怨言愤语，我都没有用来报复。倒为他说：“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里，都不像中国党这样严厉地控制知识分子！”在水渠上他受不了苦，说：“宁可回北京踏三轮，也不愿在北大荒过这种日子！”……

尽管他变得对我很坏，过去我都不想说。我很赞同托尔斯泰在《复活》中描写聂赫留道夫公爵对所经历过的曲折的发展道路时所说的那段话，大意是说：人的思想及其所走过的道路就像一条漫长的河流一样：有时清，有时浊；有时平静如镜，有时汹涌澎湃；有时曲曲弯弯，有时直泻千里；……因此我觉得——在犯错误之后，此感更深——如果抓住某一个时期的某一点，就肯定别人如何，是反科学的，也是不道德的。在某一种环境下，因某种事，可能有某种想法，或说某一种话；一旦时过境迁，认识有所提高或心情有所改变，他的想法或说法也许就会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了。我自己是如此，别人也会如此；我反对别人抓住我的一星半点死死不放，我也不愿如此对待别人。把别人的失言或偶尔——即使有意——讲出来的话，立即报告给上级，请上级及时对症下药地施以教育，那是大好事；如果动机与效果都相反，那就是伤天害理了。在云山，后一种的气氛是相当浓厚的。我从未这样做过，同时也极诚恳地希望已经这样做的人能够回心转意。当焦勇夫有对我采用这种手段的时候，我是这样回答的：“我有过许多缺点和错误，但是有生以来，还没有作过伤天害理的事。工作上和思想上的一些分歧，可以列入档案，也可以不列入档案，我的所谓书面检讨可写可不写。至于你，我觉得倒有许多东西应该向大家交代和检查的，希望你能够改正。”我遂把他往常的一些投机取巧、褒己贬人的行为以及消极错误的言论统统给数说了出来。我希望他推己及人，对大家平和些，谁知群情愕然，他也被吓住了，连忙低头认错，要大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么一小段时间，他确实老实了一点，不再耀武扬威了。

至于他是如何向领导上谈论我们的矛盾的，我就无从得知了。

六月初，我们又到畜牧二队去打草，这是才见到刘文同志，他已成了“放牛娃”，神情抑郁，面黄肌瘦。国庆前夕，被调往新疆，听说一到那里就被提升为一个分场的政治处主任，他临走时，我很想欢送他一下，可是怕给人家带去“麻烦”，之后作罢了。

畜牧二队的干部和去年一样，对我们生活上一视同仁，劳动上抓得很紧，批评是严厉的，但从不骂人。这个时候，我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日渐瘦弱，时常头晕，闫吾同志给我买了几张“同仁堂”的狗皮膏药，贴了也未见效。定量制度也开始了（四十斤左右），肚子越来越空。在表面上，我的劳动成绩不如去年了，但是我还是凭心尽力，比较起一般人来，仍然名列前茅，表扬或上光荣榜是有过几次的。问题仍然是“内部矛盾”。这时，焦勇夫又是排长了，我和焦的关系继续恶化，虽经几次交谈，决心同志式地友好相处，但他不变往日之风，致使关系无从改善。比如，他利用排长职权，蒙上压下，争宠讨好，笼络一批人，打击一批人，与他要好者，好事必然上报，坏事则隐瞒化小；与他不和者，则反之。尤其他对领导人的逢迎拍马，使我极端憎恨。他爱于在大庭广众之下，主动和领导人搂肩搭臂，敬烟擦火，获取人家嘴上的烟屁股刁在自己的嘴角上，表示与领导人亲昵无间。这幅形象是令人作呕（注：六〇年秋，他被调往850总场文教科，听说他经常在科长家里帮助扫地和带孩子，摘帽子后，随总场首长到云山视察，首长买蜂蜜无现款，都是他主动“借垫”）。

班长高恒，没有逢迎拍马的行为，劳动也相当出色，但是，他也有争功扬德的毛病，只是希望说他好，不希望说他坏。每次小结评比，大家说他好，他就满心高兴，并能同意另外一些较好的同志也受到表扬（当然，不能超过他）；反之，则草草收场，甚至大吵大闹，不欢而散。这种现象，我是不以为然的。于是他和焦勇夫“团结”在一起打击我以及和我较好的同志。

在麦收中，我和中央乐团的首席双簧管手陈永田（1960年摘了帽子，现在乐团干原来的一行，和我时有往来）割得是比较快的。焦、高等人的速度和我们不相上下，有时也比我们略少，但他们的质量稍微好一点，遂都上了光荣榜。我和陈永田改变工作方法，做到质量第一，有一次甚至超过标准，不仅一粒麦穗未漏掉，连根茬也割得整整齐齐，向挨着地皮推过去的一样。这样，我们的数量又少了一点。他们一看，立即把评比的标准由质量转到数量上去。大家都表示不平，就连焦勇夫的好朋友于善浦——青年画家，六〇年摘了帽子，留在农场工作——也愤愤然。陈永田与高恒当场大吵大骂。他们理屈词穷，只好同意把我们的成绩上报给队部。但是在光荣榜公布时，陈永田的名字仍然“漏掉了”（焦勇夫当时是这样解释的）。当着群众的面，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他们尚持此态度；在

背后，尤其是在领导人很少深入群众的情况下，他们会如何地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就不难想象了。

这种斗争虽不剧烈，却是十分频繁的。因为我看到不顺眼的事就忍不住要讲一讲，而这样的事又多得罄竹难书。例如，在草原上打草，午后有一段休息时间，焦勇夫平常绝不比大家睡得少，可是当领导人在场时他往往会把他的好朋友于善甫等人鼓动起来，大声嚷嚷：“伙计们，吃饱了肚子就加油干呐，一寸光阴一寸金呐！”我一听到这种声调，就满肚子火：上午一连干六七个小时，中午如不歇一会，下午就要不起来（耍大刀是很累的）。在正常情况下，队领导并不要求我们这样干，但是也决不抑制“群众的积极性”。焦勇夫所以这样做，目的是鲜明的。我说他们“假积极”，我对别人说：“我们睡我们的，让这些积极分子去‘积极’好了。”他们见我常常这样揭他们的底，恼羞成怒，说我这是“打击积极，鼓励落后”。

梁文华这时是一班班长，他的劳动本是不错的。但他也喜欢耍一些手腕，企图获得大于他应得的荣誉。他经常为抢占好打的草原而和高恒争吵相骂，经常舍远求近或以少报多而争取更多的赞扬；开饭时，有经常故意来得最晚，表示他“废寝忘食”，超然物外。有一次耽误了大家很多时间，久久不能分菜吃饭，我挖苦了他一下：“对后到的人应该多给一点菜”。焦勇夫和高恒对梁文华本是对立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统一”起来了，事后他们也说我这是“打击积极，反对别人为国家多干活”。

有一次，梁文华向领导上告了一状，焦勇夫被队领导批评了一顿，他怀疑是我在“拆他的台”，叫高恒开班务会，把我臭骂了一阵，其语气与用词之低级、庸俗，活像一个十足的流氓无赖，根本不像个知识分子和国家干部，更不像曾经做过共产党员的人。很多人都为我抱不平。对他进行反击与指责。而我一向是色厉内荏，在大家摆事实、讲道理的时候，我会为我自己的论点辩护得面红耳赤，声粗色怒；但是当对方耍无赖，无理谩骂的时候，我反而会气得无言以对——因为对方已经失去理智了，道理再多，说也无用。所以，我在外表上是冷静的，等他也冷静了下来，我才一一地批驳了他。

国庆十周年，云山农场决定开庆祝大会。届时，焦勇夫率领辛若平、于善甫等人到另一个分场辖区的小馆子里去大吃大喝，领导上这才发觉此人无德无能，

问题严重，给他开了一次批判会。在会上，大家揭发出来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领导上过去不知道或遮目无睹、充耳不闻的。后来，到一队去收割大豆，他又带头讲怪话和不服从调度，排长一职就被撤掉了。他老实了，对我也客气起来了。我想，为人谁能无过？！只要知道自己是庸俗的，他就不再是庸俗的了。因而我对他不咎既往，寄予厚望（我爱此人的聪慧练达和文采），以后上山烧炭时，他做炊事员，我看他比较辛苦，还提名表扬过他。谁知后来他官复原职，变本加厉，这是后话了。

六、对农场领导的意见和对国家形势的某些不同看法

五八年底，云山的领导人变动了一次，原场长兼书记白海德中校（转业前是中央公安军的行政处长）和其他一些同志被调走了，下面的一些助手被提拔到领导位置上去。原是副主任的武某某被升为主任（进）而副书记，一个姓张的廿一级的干部被任命为副主任，第二生产队的朱队长（大尉）被升为副场长，基建大队的祝大队长（起义的旧军官）也被升为副场长，另外从别处调来了一个姓王的做厂长兼书记（少校），另一个姓王的（山东籍）的当地干部作副场长。

过去，我们对农场领导，基本上是对朱指导员一类人的意见。这些人做了领导之后，我对农场领导的意见也就跟着上升了一级。在播种和麦收中，武副书记和张副主任经常在我们身后“督战”，我从未听到他们说过令人鼓舞的话，他们出口是：“就是天上下锥子，也得死在地里！”闭口是：“完不成定额，就不准吃饭，不准回家！”

事实正像他们说的那样：饭来了，大家不能按时吃，雨水淋淋，又饿又累，大家连腰也不敢直一直。而他们穿着雨衣，打着伞，挥舞着小镰刀，在那里大嚷大叫。武副书记常常抓住少数不耻（原文如此——编者）分子的懒散迟缓、衣冠不整的事实，痛骂全体。他动不动就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的原机关还管得了你们！你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我们的手里，你们能否摘帽子，能否回北京，全在我的一句话。谁不服管，谁就自找苦吃！”有时他又这样说：“你们以为你们的工资就是铁打的吗？不是的！我们完全有权重新处理，谁不老老实实，我们就可

以给他‘升级’（即加重处罚），还可以给他换一个更加合适的环境（即劳改）！”

他们把威胁、辱骂和高压手段当作思想教育与政治鼓动了。

王场长兼书记——这位少校——也不高明，每次对大家（包括军官和职工）谈到粮食问题时，他的调子差不多是一样的：“谁说我们不够吃，谁说我们吃得不好？我看我们好得很！我们领导同志的定量比你们的少，还吃不完哩！”确实，他们少数领导的是吃不完的，他们在小馆子里“包饭”，大米白面，大鱼大肉，每一片豆腐都用豆油煎得黄黄的，一切的一切都随他们吃，定量之多少有无根本无所谓，而且每月只花很少的几个钱。一旦打到黑瞎子，或野猪，熊掌之类都是他们的，或以他们的名义敬献给高级领导……他们焉有饥寒之理！他还常常这样说：“我们吃不饱？关内老百姓比我们更苦！有些地方每天才四小两粮食，人家也照样建设共产主义。我们一天一斤多，还不好？！”

对这类的“说服教育”法我极不赞同。我认为，这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会引起大家更深的反感。也许我是固步自封，过分依恋往日的传统作法。我记得在战争中，在困难中，我们的政治工作往往是这样进行的：首先摊开事实，无畏困难，然后再说明我们是革命者，对困难应报何种态度，最后还要谈到争取有利条件和战胜困难的办法，鼓舞大家去和一切困难作斗争。经验证明，这种做法是有很有效的，如果领导人再能和大家同甘共苦，同志们就会挺胸昂首，无畏一切。可是现在，他们完全换了另一套做法，这是时代潮流之必然么？是党的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精神吗？我认为不是。可是他们却又口口声声地自称代表着党，一般人也都认为他们就是党的化身，对他们稍有异议，就是“反党”、“反领导”；如果已经成了右派，那就是“不服罪”和“抗拒改造”。想到这些，我是十分哀伤而茫然的。

精神上得不到鼓舞，生活上也得不到安慰。可以说，他们根本不重视生活之改善。按照当地的物质条件和人力之可能，生活是完全可以搞得好一些的。但是，领导上不抓。建场好几年，理发始终是紧张的，冬天莫想洗澡，鞋子破了也没处修。我多次建议，最好培养几个皮匠，为大家修理破鞋破靴，亦可减轻国家商品供应上的负担，也可为大家节省点生活费用，但始终没有人理睬。大家花了很多钱买一双鞋，穿不了两个月，或在林中被戳破就不得不丢弃了，看来令人心痛。有一个生产队有一个老头会修鞋，县城的鞋业合作社偶尔也派人下来帮帮忙，但

人少路远（队与队之间相距很远），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在战争中，生活不能说不苦，然而大家的精神是乐观的，生活是活跃的。可是在云山，我们感觉不到这种气息。在一般职工中，是听不到歌声的，场部经常放电影，而离场部较远的生产队，一年也看不到一两次。

不抓生活而抓生产，生产是不是就搞得很好了呢？不是，远远不是。可以说，他们就不明确为什么要搞好生产。道理人人会讲，而他们的精神实质远非如此。每次播种、麦收，所有的领导都大嚷大叫地要快，其口号不是“多打粮”，“打好粮”，而是“争取第一”和“向上报捷”；不管实际可能如何，也不管怎样才能把生产搞得更好，一切的一切，只要按时——最好是提前完成上级的计划就成。因此，这种“第一”和“报捷”对国家、对人民有何真实的好处？

小麦、大豆割下来了，堆在地里，一时脱不出粒子来，机器不能算少，但是故障频多，不用时日晒夜露；要用时，修理没有个完。我也建议过多次，或购办人力脱谷机，或男女老少齐动员，把粮食收进仓再说。运木、修渠等事可以慢一点，人们讥笑我自作聪明。据说，领导上会有全面的安排，听党的话不会错。这样，每年八九月收起来的粮食垛子，都要到第二年春天才能脱完（粒）。经半年之久的风吹雨淋，兽食鼠耗，损失颇巨。春耕时有的还没有脱尽，有的已成半霉烂状态，不得不付之一炬。场部的一个工作人员贴过一张大字报说，五九年的粮食因此而损失三分之一。而弄到手的又有很多是霉烂变质的。云山著名的“头痛粉”就是用自己的小麦磨制的，很多人吃了这种面粉，头晕、呕吐，有的还拉稀。本可以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结果不得不向外地“求救”。

抽了很多上山伐木，伐倒的很多，可是运不出来，很多宝贵的木材都腐烂了！

生产如此，生活如此，对人的态度又如此，一般的人，谁还愿意在这里生活？谁还愿意“以场为家”？谁还愿意“鼓足干劲”？右派中固然有人逃跑，“支边”青年中开小差的则更多，个别军官或干部不要党籍、团籍的也不是没有。农场搞不好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工资发不下来有什么奇怪的？党满心希望农场为祖国创造财富，结果反成了累赘了。

这只是我到国庆十周年时所看到的一部分，远不是农场问题的全部。就这些点点滴滴的问题说来，已是够一个良心不死的人的苦恼与疑虑的了。我常常愤懑

地想：这些人要把农场领向何处去？王震部长也常来云山，是否发现了这些问题？怀疑不满之余，我和一些人在背后论长议短是有的，牢骚怪话也是有的；但是我也正面地提出过意见，日常提过，帮助领导整风时也提过。好的收效没有，我所得到的“反对农场领导”的一顶帽子。

在国家生活方面，作为生活在最下层的劳动者，对若干问题早有切肤之感了。

对“总路线”和“大跃进”，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其正确性，在行动上也是真诚拥护的。但是我反对那种“要铁不要人”的“跃进”法，反对那种虚张声势的“放卫星”和“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幻想式的口号，对大小报刊上连篇累牍的“几千斤”、“几万斤”的报道公开表示不相信。对人民公社，我同意它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基层组织形式，但是我也认为搞得太早了，太快了，连试点都等不及。全国农村的合作化，由初级社到高级社，再从高级社到公社，充其量不过三四年的时间，我们的社会制度就是再优越，生产力的发展也不可能上升得这样快。我认为这是对形势——生产力、物质条件、人民的觉悟、干部力量与水平等等——估计的错误，它是人为的，而不是“应运而生”。当然，公社也有临时性的好处：可以抽出千百万人大炼钢铁、大兴水利，和准备应付一触即发的战争（当时，我认为形势是比较紧张的）。

那时，我也读到了中央的一些决议，报纸的议论和一些领导同志的谈话，总的印象是：鼓舞很大，调子太高，乐观得过分了一些。在听到把“十五年”超英改为七年“接着又改为”三年“的传达报告时，我简直莫名其妙。我想，除非马克思显灵，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二郎神”，否则我们是走不了这么快的。当时，晓旅（1958年3月与戴煌离异的前妻——编者）正在徐水办报，她给我寄信说，徐水将在一九六二年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在给她回信时，我没有表示异议，我怕她骂我“顽固不化”，然而在我的内心里认为这是胡闹，是向马克思、列宁的脸上抹灰，是想惹起全世界对我们的嘲笑。而不是羡慕和赞佩。

在具体执行中，我认为很多迹象是不太美妙的。我们不可能看到任何内部的材料，也听不到什么传达报告；就是看看报纸的标题，也有所感触。中央在“总路线”中提出了一系列的“并举”和“两条腿”方针，可是在新闻报道中，我们只能看到“独脚舞”。为了几位大元帅升帐，千万名将军和校尉们的路子被堵死了；为了加强重点工程和企业或支援别的什么，许多手工业生产、小五金行业和

服务性行业被紧缩，或挤掉了；为了加强集体经济和饲养管理，农民的自留地和家畜都交公了；为了加速公共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农民的所得几乎只够吃饭的……（注：五九年春，人民日报头版大字标题：广东沙洲[原文如此——编者]公社积累 65%，分配 35%。报道中认为这是共产主义风格，我当时对一些明白事理的人说：“这等于号召大家都来犯错误。”）

我们无需从理论上去推敲研究，就从云山这样的国营农场的现实来验证，这样的搞法也是颇成问题的。如养猪，国家耗费巨大，但管理不善，技术力量不足，一直是赔本交易，公社在这方面会混乱到何种程度，不难想象。即使从长远观点来看，这一切都是对的，但新的未见成效，旧的已被破坏，必然会发生青黄不接的现象，国家的建设和人民的生活已经发生重大困难。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之被挫伤所带来的损失，将更无法估计。我们一时头脑发热，国家和人民付出的代价将是异常巨大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日子越发不好过了。从五九年春天开始，我们就尝到了粮食不够吃和商品困乏的滋味，以后每况愈下。可是报纸和领导人的报告却说我们战胜了空前严重的自然灾害，仍然夺得了大丰收，绝大部分工业品的量和质都提高了等等。可是这些东西到哪儿去了呢？当时提到了很多的理由和指出了许多的去处，这对生活在下面的人来说，是很难信服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吗？没有，而是不折不扣地下降了；支援了重点地区了吗？没有，我们是在边疆，是在新开发的地区，是高寒地带，按照报纸社论的精神，是应该受到特别照顾的，可是我们丝毫也感觉不到什么照顾，连正常的供应也无法维持了；对农村的供应加强了吗？从某些方面来说，是这样的，如托儿所用的小勺、小碗等等，但是总地说来也未必如此。据河南、山东、河北、四川、辽宁等地来的“支边”青年说，他们在“公社”时更苦，饱肚子是谈不上的，过年过节也吃不到鱼和肉，劳动了一年才买了一双鞋。这样“农村供应之加强”又从何说起呢？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还这样说过：全国人口六亿多，每人多吃一两糖、一斤粮、一两肉，国家就要拿出多少多少“物资”。于是我就想：如果翻过来算一算，每人多生产一点东西，不是也很可观吗？何况自从“大跃进”以来，大家付出的劳动量远远超过以往的任何时代。可是，我们的东西就是少起来了，而且越来越少了。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许多劳动是无效的，或者在同一个单位时间内，所创造出来的价值远

远不如过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仅有“天灾”，并且有“人祸”——在某些方面和某些地区，这也许是主要的。

类似这样的问题，我每天都有所考虑：自己提问题，自己解答，也常常和一些比较关心国家大事的人谈长论短，互泄怨艾。在正式的会议上，我是不敢有系统地畅论国计民生的，我怕不仅解决不了问题，提高不了认识，而其必然会引起更大的麻烦。可是，我又不习惯于隐瞒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语不由衷”是可耻的。在检查、讨论、小结或作鉴定时，我还是或多或少地谈过一些思想问题，才是自己感到于心无愧。

七、第二次被否定及自己的态度

我和班排长们的关系搞得这样坏，对农场领导及国家事务有这样多的意见，那些心怀叵测的人们对我的不善之为也就有理有据了。当然，在公开场合下，他们还不敢欺侮我。

有一次，大家作小结，我以检查自己、提高认识的态度，谈到了和别人的关系，对某些事务的不当的态度，有时对农场领导提意见还缺乏善意，对国家大事也提出了一些疑问，如“吃的用的为什么越来越少？”“人民公社是否搞得太大太快了？”等等。大家认为我是诚恳的，连高恒、焦勇夫等人也不得不在表面上赞许一番。但是，畜牧二队的盖队长当时在座，他大概是从班排长们的口中听到了关于我的许多坏话，特地来“旁听”的。我的发言已在大家的赞同下通过了，他突然说我的问题很严重，尤其是对国家生活的看法，是对党报不信任的表现。大家没有进行批判，反而认为这是敢于向党暴露思想而给予赞扬，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右倾”。于是他要大家和我的思想划清界限，给予严肃的批判。这样一来，大家的话锋立即转向，纷纷检查自己“觉悟不高”、“立场不稳”和“政治嗅觉不灵敏”等等。老实一点的人在检查自己类似的思想问题之后，才对我进行批判；不老实的人则假冒好人。因而，为了我又多开了一次班务会。我，无形中地又被否定了。

我虽然做了检讨，而内心中是不甘心的。我的劳动，是尽力的；我之待人是诚实的；我对一切不好的现象和值得疑问的问题，是勇于提出来的。虽然，这当

中可能有看法的片面和结论之谬误，有时也有自认为高明而指责他人的错误情绪和态度，但是，我的爱憎和目的是什么？难道是为了一己之利吗？我觉得，问题必须明确，是非必须澄清。我每次要求畜牧二队的领导和云山派出所的李所长和我谈话，请他们开诚布公地指出我到底有哪些问题，对的，我接受；不确切的，我更正；误解和谣传的，我解释；有意诬陷的，我提供情况，并请组织上派人到群众中去调查核实；我仍然想不通的问题——如国家事务之类，请党进行说服教育。我认为，我抱这种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没有什么错误，虽然这也是为了个人的命运；但是，当别人不能秉持公正、仗义执言，而领导者又不能明改清晰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大智若愚”地听任别人在我的身边撒沙喷雾呢？可是，领导上对我采取敷衍、拖拉和互相推诿的态度。大概他们认为很难办，很难说服我。畜牧二队的绵队长倒是说过：“大家都是老同志，应该谈谈，早点解决问题，”可就是“不见人下来”。最后只是盖队长和王副指导员在草原上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没解决什么问题。几天后，他们在全队面前讲话，批评我老是想一些与党的观点不一致的问题，这是很危险的。他们说：“党把要说的话都说了，改不改全在自己。”这使我很苦恼，很矛盾。“过则勿惮改”，是孔老夫子的一句名言。明理者，谁不愿意改过？谁不想和党完全一致？可是，有没有人帮助我解决问题，难道要我昧着良心去认黑为白、指鹿为马吗？修养和态度方面的缺点可以改正；具体问题的分歧如不辩论解决，如何去“改正”呢？

当时，已是中央公布“摘帽子决定”之后，我的朋友们都为我着急和担心，尤其是我的女朋友陈敏凡（注：陈敏凡，吴祖光小集团主要成员田庄的妻子，现年廿七岁，十四岁参加部队文工团，后到文化部电影局做秘书。为人比较热诚善良。到北大荒后，田庄表现的懦弱、颓丧和悲观失望。她十分恼怒厌恶，决心和他分开；我受到的处分比田庄重，妻子也离开了，而表现却相反，因而她真挚地爱我，后来他俩又好了。现在我和他们都是好朋友。党如认为必要，容后再叙。）对我关切特甚。她要我遇事深切思考，审慎地发言，并要我找派出所李所长谈话，向新华社党委反映情况。我照她的意见做了，四次要求李所长谈话均未果。这样，给原机关写信也就毫无意义了。我知道，当只能依靠自己的组织，而不会相信个人——尽管个人的意见也是可以听听的。我只好告诉她：表扬、奖励均身外之物，可有可无；摘帽子与否也只是形式问题；值得我们终身努力的是改造提高，追求

真理。不管别人如何看待我们，只要我们不做亏心事，无愧于人就行。她承认这是对的，但认为我思想偏激，方法欠妥，尤其是不看时间、地点、条件，一味地“愚忠、愚诚”，这会吃大苦头的。我接受了她的观点。我深知，“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处世哲学至今仍然有效，无数的共产党员和真知灼见之士也是这样做的。为个人的前途，为家庭幸福，我何不可也如此？但是，不平静的生活使我不能永远地平静和沉默下去。

五九年国庆后，我们到生产一队去割大豆。此时的一队对我们的态度已大不如前了（比朱麻子还是好得多）。一队的伙食素有盛名，而我们一去，立刻变成了一天三顿粥，时而发一两个小馒头，稀粥还常常不够。我们得到的安慰：“下顿再多喝点吧！”到了下一顿，并未多喝到什么。不久，场部决定我们在驻地附近的电锯厂代饭，仍帮一队干活。第二天，一队的伙食突然“大跃进”：馒头随便吃，菜多汤也足，还有大油条。而我们却是“头痛粉”的小馒头四个，名义上八两，实重不足八成，副食是两个指头大小的咸萝卜一块，加上温开水一杯。大肚皮饿汉，至多吃半饱。当时仍在一起干活，吃饭也在一起。相形之下，贵贱分明。莫说处于身受歧视冷落的地位，就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局外人，对此也不能不愠怒。俗话说：“饱时一斗不足惜，饿时一口贵过金”，难道因为有了灾荒，人人自危，就可以做这种缺德的事么？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农场所应有的风气么？这种人能和大家同舟共济、战胜困难么？当然是不会的。以后的情况恶化多了，很多生产队对我们明目张胆地进行克扣和凌辱，我们完全成了“讨求施舍的奴隶”（某工程师愤语）。

生活如此，而工作一点也不要我们少干。有一天，太阳落山了，队里的军官职工都回去了，而任务尚未完成。赵队长对我们大发雷霆说我们的动作慢，而实际上是给我们的任务太多。他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想要我被撤职还是怎么的？”原来那一天是全场突击，场部规定各队必须堆完最后一把大豆。否则，队领导将被如何如何。因此他很急，命令我们吃饭后继续干。当夜雨雪飘飘，我们单衣薄裳地在地里打转（有人有绒衣、毛线衣），依靠着手电筒，把零散的豆把聚集起来。深夜才回去。为国多出力，谁也不会有怨言。可恼的是这些干部首先想到的不是国家的利益，而是自己的虚荣和地位。任务未完成，不是要所有的人同心合力继续努力，单单要我们去干，好像农场的盛衰只是“右派”的责任。

十月中旬，厂部给每人发一斤半大米，这对云山人来说，等于吃“全聚德”一样的高兴。我们工作在一队，建制在畜牧二队，伙食又在电锯场，形成“三不管”。实际上已被畜牧二队领去了，可他们要我们向一队要。我们向一队要，一队又要我们和电锯场交涉；问场部，场部说早发下去了，但又交代不出领主儿来，只好叫我们到这三个单位去打听；而这三个队都说不知道，理由都很充足，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气恼了。过去我们早就听说过，许多生产队利用我们调动频繁到处打零工的特点，实领少发，贪污我们的油粮和特殊供应。那时我还将信将疑，现在亲临其境，有人说：“但愿这次不出问题吧！”我说：“很难说。我现在是劳动者，一切从实际出发，眼不见不足信。”最后，终于查出根底，把四十六斤半大米追了回来，卅个人一顿就吃光了，有些人还不够。

我承认，我的涵养很差。生活中，这类的不快事件很多很多，很多人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偏偏是我不讲就不能过。十分明显，我对这种种现象的反感，与对党的态度是不能牵连在一道的；而且，我觉得，正因为这些行为不义不睦（呢），违背了党的原则，我才勇于表示不满的。可是，班排长却抓住这些把柄，加油添醋地汇报给队部，说我“处处对党不信任”，这是在上山烧炭后，烧炭中队的中队长张兴源转告给我的。

我们上山烧炭时已是十月底了。烧炭队属于场部工副业队，共有三个排，那两个排是从云山的右派分子集中地（注：五九年麦收后，云山各队的右派分子和有历史问题的分子都集中在基建大队，大兴土木。只有我们这个排例外）——基建大队调来的。过去耳闻，基建大队的情况很不妙！在王副场长和祝大队长的严酷统治下，大家吃不饱，活挺重，受气挨骂，得不到休息；多数班排长蒙上压下，为非作歹，大家感到前途渺茫，“苦海无边”。许多不坚定的分子和原来品质就很恶劣的分子，这时都露出了真面目：争、抢、偷、骗、打、骂。投机倒把、调戏妇女、不讲公共道德等等的现象，层出不穷，甚至还有谋财害命的。我们的方约（新华社的同事——整理者注）当时已成了著名的小偷之一，我非常痛心。领导上本来就有问题（注：云山的领导是有很多错误的。我们回北京后，才听说那里的很多干部受了处分，武副书记被降为支部书记，并调到另一个分场，王副场长和祝大队长是国民党特务），看到这些人如此不肖，怒上加怒，视一切违背党的原则精神的做法为理所当然；不法分子们也就来个“狗急跳墙”，软磨硬抗，

弄得整个基建大队乌烟瘴气，无法无天。本来，一般人对右派分子是敬而远之的，也有少数抱同情态度的，认为我们只是“说错了话”，经这末（么）一搞，气势急转直下，“右派”成了卑鄙下流、阴暗的代名词了，成了人人都要侧目而视的异物了，弄得一些本很清白的人也抬不起头来。

现在看到这两个排，才证实往日之所闻并非虚传。他们也带来了一些混乱、颓废、堕落的流毒。我们这个排对他们是有戒备的，中队长张兴源特别把我们和他们分开来往，因而我们没有沾染上什么坏的习气，全排的情绪依旧是比较好的，除开无原则的口角外，各方面都较正常。唯一的痛苦是吃不饱。定量不能算少，有六十三斤，突击时还增加到七十二斤，但在山下时已经饿了好几个月，打窑烧炭的活又很重，再加上缺少副食和管理不善，问题就显得严重了。在基建大队中，头晕、浮肿已成了普通的现象，病号照常干活；现在在烧炭中队，这种现象也开始露出苗头来了。但是我以及我们排的全体，都在挺胸以待，等待中央考察团的到来。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处境能够有所改变。

八、“高恒事件”与第三次被否定

五九年十一月中旬，中央考察团来了，人人欣喜若狂。我自知错误严重，处分特别，来北大荒后的遭遇亦非寻常，这次不会有何希望。然而“他乡遇故知”的兴奋还是有的，并且希望考察团能够兼听细访，澄清若干问题。我立即给我们保卫科的孙书明同志写了一个便条，要求见面。次日，孙书明同志就来了，很热情。大概他已通过组织路线摸了一下我的情况，对我的劳动表示满意，其他方面的进行了批评。我本想向他衷肠倾诉，看来时间不许可，第一次相会就匆匆地结束了。

在讨论摘帽子问题之前，我们听了考察团同志的报告，学习了中央的决定、社论和研究了三条标准。在全排讨论谁可以摘帽子的时候，我根据中央的精神，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在我发言之前，已有不少人提出了一些可以摘帽子者的名字，主要的是徐琴久——故宫博物院的见习研究员，梁文华，其次是高恒，还有人提到焦勇夫、辛若平、于善甫、李兴文等等。我根据许许多多的事实和许多人日常的反映，提出了我个人的看法。我首先同意徐琴久可以摘帽子，因为他的劳

动一贯积极，没有投机取巧、沽名钓誉的行为，也没有过严重不满的言论；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够诚实，不敢暴露思想，在向领导人谈别人情况时有不确切之处，我觉得这些问题可以在回到人民队伍之后去解决。对排长梁文华，我是既同意也不同意，同意的是：他劳动卖力，也会出主意，能够克制自己，不随便发牢骚，关于自己的错误和处分，没有说过不服的话；不同意的是：不敢敞开心扉，有争功夺利的表现——这说明了劳动观点之不纯，对自己的问题是否真正诚服（原文如此——编者），还是个疑问。到底怎么办，组织上决定。对焦勇夫及其以下的几个人，我都不同意，我看到了他们的一些长处，但他们的缺点是主要的。对于高恒，我抱着坚决反对的态度。高恒的劳动过去是一贯积极的，在执行班排长的任务时，也是比较坚决果断的，对自己的问题，没有说过不服的话；对农场领导的不满，致使“敢怒而不敢言”，而不是随便说怪话，这是好的。但是，他有着很多严重的问题。第一，不敢向党暴露思想，就是对党不老实，不信任了。第二，在班内和班外，经常争功夺利，这是“表现好”的动机不纯。第三，生活作风不严谨，喜欢讨别人的小便宜和揩油；在云山时，常常在夜间偷军官家属的大萝卜和西红柿（到菜地里去摸的）；收割大豆时，领导上三令五申，不准搞公家的大豆，他身为班长，比谁搞得都多，最后，别人把非法搞来的豆子纷纷上缴，请他转交队部，他居然把这些豆子炒熟，和班排长们偷偷地吃掉了（班排干部开会时吃的）；尤其令人气愤的是：全排正在斗争盗窃嫌疑犯王跃光，高恒作为“秘密检察员”发现了王跃光有一些来路不明的食品，居然背后向王讨要，我认为这种品质是相当恶劣的。第四，自从中央公布了摘帽子的决定之后，畜牧二队的领导找他和徐琴久、梁文华谈了话，要他们填了摘帽子的表，他的干劲每况愈下，经常完不成任务，对大家的态度也日益粗暴起来，偷吃别人缴公的大豆和向王跃光要赃物也是在这个时候，这显然是自认为已经过关，用不着再“修身养道”了。这种改造态度是虚假的，是党所不希望的。第五，政治道德败坏。他在中央考察到来前后的关键时刻，竟利用班长职权，为自己的朋友涂脂抹粉，邀功骗赏；对自己所不满意的人则打击压制，甚至进行政治陷害。例如，在上山后的一次评奖会上，大家明明批评了他的朋友张岸久（注：张岸久，原新华书店的伙食管理员，能说会道，十分油滑，一贯不老实，为大家买饼干、代乳粉总要贪污钱、物和粮票。大家叫他“京油子”）投机取巧，媚上讨好，做炊事员时贪污粮食，给高恒

多搞吃的等等，他在整理材料时，竟敢偷天换日，把张岸九说成好人，请上级给奖；而把大家提出来的应该给奖的石铁生（注：石铁生，清华毕业生，《世界知识》编辑，本社对外部孙健霞的姨兄，现在内蒙人民出版社）——我的朋友，反而给“忘掉了”。材料整理好以后，他怕露出马脚，不敢让大家通过签字（我们这个排一贯有此传统，以后由于和基建大队的那一帮子人打乱建制，班排长就完全独断专行了），偷偷地送给了队部。我得知这一情况，估计内中可能有鬼，问他是怎么整理的，他支支吾吾，我遂跑到队部去把材料追回，真相大白。中队长张兴源大怒，宣布这一次全排的请奖材料统统作废。

由于我揭破了他这种卑鄙的底细，他对我恨上加恨，在讨论摘帽子三条标准时，他竟然想对我进行政治上的暗害。我发言的大意是：“达到这三条标准，就说明已经改恶从善，不再是敌人，而是人民内部的一分子了。但这只是由右向左跨了一大步，进入中间状态，远不是左派，更不是自我改造的终结。不论谁一旦被摘掉帽子，千万不能因此而满足，而应该以最优秀的共产党员的标准，永远严格地要求自己。”我发言未了，做记录的石铁生急着要小便（每天三顿稀，大家的小便特多），由高恒代记，我发言完毕，石已回来，跟着发言，故由高恒继续记下去。石完全赞同我的看法，并加以发挥。散会后，我想起了请奖材料的教训，向高恒要记录看。他起初不肯给，说“夜很深了，快睡觉吧！”我再三坚持，别人也叫他拿出来，他才给我。我一看，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他把我和石铁生的话全给歪曲了。按他所记得来分析，我是主张我们从右向左转了一步之后，永远做中间派，不要争取做左派。因此，石铁生的发言就成了对我的批判，说我是鼓动大家落后，继续反动。我不能不惊呼和高声责问。同志们争相查阅，人人愤慨，就是焦勇夫（这时是炊事员）也不得不说了几句公道话，认为高恒做得很不对。高恒窘态毕露，伪称是“笔误”和“打瞌睡”。可是，他是个做了几十年记者和编辑的人，不可能对这样浅显的道理发生“笔误”，而所记字笔工整，也说明不是“打瞌睡”。他只好连连道歉，修改了事。此事说明，其为人是十分卑鄙而毒辣的。

综上所述，权衡其优劣，我认为不能摘他的帽子。开会前，我也同王雪松、田庄等人酝酿过，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因此，在我发言之后，反对高恒摘帽子者为数颇多，以后再也没有人出来推举他。

第二天，考察团中的一位同志（与高恒同一单位）来找一些人谈话，和我也谈了一个多小时。本来我想谈谈对农场的意见和改造工作中的问题，但时间不允许，他要我将这些问题写成书面材料（没写成），而先面谈说可以摘帽子。我遂把在讨论会上发表过的意见重述了一遍。

我的意见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尤其是焦勇夫、辛若平、李兴文和张岸九等人。这不仅因为他们和高恒有朋友关系，而且我对他们能否摘帽子提出否定的论点。论点是无可辩驳的，但不能消除他们对我的憎恨。高恒本人对我尤其恨，可又无法否认我所指出的问题，他只能惶惶然地对梁文华说：“我完了，这都是自找的！”梁安慰他说：“组织上会有组织上的看法，依靠组织，相信组织。”

十一月廿三日，云山的右派分子被集中到基建大队，举行摘帽子大会。会前，李兴文等人悻悻地说：“等着瞧热闹吧，如果高恒真地摘不了帽子，那就说明戴煌是正确的了；如果还是摘了，那他就是又一次反党，他所反对的人就都是好人。”结果，高恒在内，是最后一个。显然，考察团事先是有犹豫的。当时考察团的负责人（似乎是人事局副局长）在讲话中提到：“有这样的人，估计自己摘不了帽子，也坚决不让别人摘；或者说大家都好，言下之义是自己也可以。”我想，这种批评与我无关，我根本没有过这种态度。至于高恒的问题，我服从党的决定，但是我要保留己见，因为我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并且还高恒本人表示过。古云：“无欲则刚”，我不怕恼人。

晚上一回来，队部就要我们排讨论摘帽子名单时的会议记录；第二天、第三天，焦勇夫、李兴文、辛若平等人，以及被摘了帽子的高恒、梁文华、徐琴久先后到队部去和考察团的同志谈话。廿六号晚上，烧炭队开全体大会，由工副业队指导员隋风祥讲话，有一段话是指名批评我的。他说：“戴煌到北大荒后一贯表现不好，不管到哪个队，都有一整套意见；不仅对队领导有意见，对整个农场都有意见，对大跃进、放卫星和人民公社也有意见，似乎他比中央和毛主席还要高明。这次自己估计摘不掉帽子，也决心不让别人摘，这是对党负责吗？听说很多人都佩服他，怕他，凡事都跟着他跑，他有什么可怕的？他有什么本领？党把他培养了这么多年，从小教到大，可是他从战争到和平，从国内到国外，没有给党干过一件好事，反而练出了一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领。大家应该和他划清界线，对他进行斗争，他自己也要悬崖勒马，严格地批判自己。否则，他不能再拿

国家的卅二块钱，而要送去劳动改造！”

好了，这是到北大荒后的第三次被否定，而且被否定得最彻底；不仅被否定了到北大荒后的一切努力，连过去的十几年也都被否定掉了！实指望中央来人后，能够清晰是非，消除我的忧虑；结果却落入海底，永远不能翻身。我满心想为党负责，对这次摘帽子还抱着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态度；结果却招来没顶之祸，身败名裂！

当场我不便起来申辩，回排后，新排长王雪松——梁文华推荐的继任者——奉命要我准备检查，我也没有检查。我一方面觉得问心无愧，而另一方面，抑郁和痛苦是难以言喻的。我要求隋指导员和我谈话，他不理，我又要求孙书明同志再面谈一次，他来了。孙书明同志这次的态度十分严峻冷淡，我怕不能把满肚子的话一口气吐出来，把自己的心给挖出来，但是我的思想混乱，心情悔丧，什么也说不出。我说了一回，自觉凌乱无味，反身求教。他讲了很多基本精神是：“经过这几天的摸索，终于摸清了你的情况。你过去写给普金、周思义的信把你说得太好了；事实上你的所做所为，变本加厉，比较起在北京，有过之无不及。你如果再不幡然悔悟，脱胎换骨，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孙书明同志说此话时，其语色之严，宛如忠国爱民之审判官对于一个自甘堕落的罪犯。我只能连声唯唯。我深知，他的说法是何根据，他的警告有何分量。可惜的是：他的了解是片面的，对我的判决是欠于公正的。我自己明白我的心是什么样子的，我有哪些优点，而又有何等的缺陷和谬误。我半生以来，即没有“居心反党”于先，也没有“顽而不化”在后，也没有做过什么欺心昧良的事情。但是，党既然对我有此固定的看法——他只能相信自己的组织，我个人有何妙法去改变呢？古今中外，许多英豪圣士，也免不了“名之所至，谤亦随之”，何况我这个已被党逐出大门的不肖之徒！看来，只有在自己的同志把我推上断头台之前，我高呼三声“共产主义万岁”来表白自己的心迹了。最后，我还是问了孙书明一句：“党还期待我么？我还来得及么？”答：“来得及，但不能久待了！”

没有几天，我们这个排被分成两部分。我被指定跟随焦勇夫、李兴文等人到另一个烧炭点去和原是基建大队的那些混乱不堪的人们编在一起。和我比较谈得来王雪松、田庄、石铁生等人则留在原处。我感到此去凶多吉少，忧伤备至。多少年来，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前途悲观过，但时至今日，我不能不痛感到来路

艰险，去路茫茫，一时哀苦，泪流满面。我问王雪松：“调动的名单是怎么拟定的？为什么要把我和这些人搞在一起？你不能把我留在这里吗？”他说：“我一点也不知道，有啥办法！”无奈何，我只好背起行李离开了。田庄等人在背后再三叮咛：“老戴，道路崎岖，好生珍重啊！”

初到新地点，焦勇夫又做了排长，李兴文做了班长，据说是因为他们在高恒事件中向党提供了很多“真实”的情况。当天晚上，隋指导员在新地点——新电锯（注：原来的地方叫老电锯，这里叫新电锯，先后都是锯材厂的旧址。实际上，当时的电锯厂已搬到“十八公里”的地方，就是我们帮助一队割大豆时搭伙的所在）——向大家讲话。看来他已忘了我的事，准备戴帽子走了。焦勇夫递了一张纸条子给他，他立即转了话锋：“对，我到给忘了。戴煌到这里之后，要继续检查交代，不能以为换了环境，事情就过去了。大家应该对他进行监督。”

大家每天累得很，谁也不愿多开会。我只好顺着领导上的看法，在班里检讨了一次，承认我看问题不全面，和党的观点不一致，曲解了高恒，因而是立场问题。其根本原因不是对党负责，而是有个人成见等等。其他人，不管对我了解不了解，照例都要表示一下态度，不外乎“划清界限、监督斗争”之类。但是也有一些人水平较高，或对我比较了解，并不认为我是坏人或是完全错了，因而在发言时尚比较客气和有分寸，他们说：“对戴煌同志错的地方，我们要批判；但对他本人，我们要团结尊重。我们要互相监督，相互帮助。”

我这边的事情结束了，原来的地方——老电锯却风急浪涌，在辛若平的“大胆揭发”之下，我还有一个小集团成员是王雪松、田庄、孙汝飞和杨川林（后二人也到了新电锯）。于是，他被提升为排长（与我做对的人都飞黄腾达了）。这一下越发不可收拾，任意地诬蔑我和攻击我。此时，孙、杨二人和我在一个班，他们得知新情况后，都莫名其妙，我们平时除了谈谈玩玩、对高恒的事有过议论之外，没有过任何活动。他们立即检讨了一番，表示浪子回头，站稳立场；同时又埋怨我。杨川林对我说：“我不知道你哪来那么大的劲头，事事都要追求真理！人家不追求真理也照样吃饭睡觉，党还认为是好人，而我们却成了头号大坏蛋！”孙汝飞说：“不能省时察势，也等于醉生梦死！”

不久，王雪松和田庄也被调来了。据说是为了搞清楚小集团问题的。他们的情绪很颓丧，恼怨我有话存不住，使他们也跟着倒霉。（未完待续）

【读者来信】

1. 赵超谈120期郑仲兵的访谈

我以前看过郑仲兵谈文革的文章，给我的感觉是，他着眼的都是文革研究中的大问题。这次又在贵刊上看到他的访谈，更觉得他的眼光的远大和洞察的深刻。希望贵刊多搞一些这类的访谈。

2. 顾训中纠错

120期上的郑老师的口述文章提到的1967年初的那位公安部副部长。此人叫严佑民，贵刊误为“颜又明”。“粉碎四人帮”后严佑民参加苏振华带领的中央工作组到上海，后留在上海任市委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华东师大学生王申酉就是在他的主持下，于1977年4月底被以现行反革命罪枪毙的。

3. 120期郑仲兵访谈中的其它问题

有多位读者来信指出郑仲兵的口述中，存在着一些误植——

统战部那位处长“刘颖”应为刘郢；学部“连队”应为联队（红卫兵联队）；李青昆应为李清昆；“65军”应为“63军”；“001”应是为“007”。

另外，还有一些提法不准确——

原文：“为什么这张大字报会起到摧毁工作组的作用？”——聂元梓的大字报是5月25日写的，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起到了摧毁北大党委的作用，并没有起到摧毁工作组的作用；工作组是7月25—26日中央文革小组到北大讲话后被宣布撤出的。

原文：“因为北大一开始虽然成立了革委会”——北大在工作组撤出后（1966年7月底）成立的是“文化革命委员会”（1966年9月9日正式成立），并不是革委会。1969年9月27日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进校后，才成立革委会（9月27日成立）。

4. 胡宗式、章铎谈郑仲兵访谈中存在的问题

第4页：“高教部卢正义、徐非光的大字报也比聂元梓的早。”这话不确切，他们的大字报是1966年5月26日凌晨贴出，署的日期是1966年5月25日。

第6页：“曹轶欧作为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派出的工作组……”，这里的“中央文革小组”应该是中央理论小组。

第7页：“还说他们的后台是关锋、王力。”这与事实不符，因为当时不可能公开提“关、王”，只能提吴传启等。

第11页：“工作组走了后，北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里的革命委员会不对，应该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1966年7月28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9月11日，校文化革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校文革常委和正、副主任。北大的校文革当时是权力机构，胡宗式等的毕业证书上盖的公章就是“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时间是1969年9月27日。

第12页：“三月初，陈伯达在北大就说……；第二天，北大井冈山兵团宣告成立。”这与事实不符。实际上，这是指陈伯达6月5日讲话（就是人们通常说的“6.5讲话”）。首先，这个讲话的地点在人民大会堂而不是在北大（《北京大学纪事》说是陈伯达在北大的讲话，这个错误被好多人反复引用）。陈伯达的6.5讲话，使北大发生了巨大变化，北大从此开始大乱了。这个乱的过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井冈山兵团成立的时间是1967年8月17日（不可能是“第二天”）。奚学瑶（井冈山兵团中文系负责人）在他的《青春非常之旅——我的“文革”印迹》一文中对这种乱的过程有生动的描述，摘录如下：

六月五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来到北大，不知道那根神经触动了他，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他严厉地批评了聂元梓，说“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北大是死水一潭”。于是，蕴积在人们心底的火山，“唿啦啦”一下猛然喷发了，“北京公社”、“红旗飘”、“井冈山”、“东方红”纷纷亮明了反聂的旗帜，新北大公社内部也冒出了一个“革命造反总部”，公开与聂元梓切割。于是，“团”（新北大公社战斗团的造反总部）“0”（0363）“飘”（红

旗飘)“井”(井冈山)“红”(东方红),以不同的音色音阶,组成了一场反聂大合唱。北大顿时天下大乱,“大一统”的局面被完全打破了!聂元梓被突如其来的形势闹懵了。但是,孙蓬一等校文革的鹰派人物,立即组织了新北大公社“红色清道夫”、“红梅”等16个战斗队,成立了“六六串连会”,发表了态度强硬的声明:“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命的主要对象,是革命不共戴天的仇敌,‘东方红公社’、‘井冈山公社’的跳梁小丑兴风作浪没有好下场!”

反聂与保聂两大派斗争迅速激化。

北大两派斗争的局势日趋明朗,学生们冲在前头,教员、干部们则紧随其后。北大上下,除了被抓进牛棚,或由于出身不好、有所谓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而被打入另册的人之外,全校的绝大多数学生和教职员工,都各自亮明了自己的观点。站到了不同的阵线。周培源、季羨林、周一良、侯仁之、赵宝煦等名教授态度鲜明地站在了反聂的阵线之中。七月一日,以周培源为首的134名干部发表了《致革命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明确表态:“3月份以来,‘校文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同时表示:“‘红旗飘’、‘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尽管这份声明,对强烈批判聂元梓的“东方红公社”、“井冈山公社”持保留态度,但它已明确地宣示,134名干部已否定了聂元梓的领导地位,站到了聂元梓的对立面。

以周培源为首的134位干部的讨聂声明,从根本上动摇了以聂元梓为首的钦定的校文革的统治地位,使中央文革为之震惊。七月十日,陈伯达再次发表讲话:“我批评聂元梓是支持她、爱护她。聂元梓不要打倒,还要当红代会核心组长。对孙蓬一不要打倒,要一看二帮。”并调转矛头,对反聂派威胁道:“你们用我的话攻击聂元梓,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陈伯达在北大扮演了一个尴尬角色。他成了《水浒传》中的洪太尉,掘开了镇压妖魔的石碣,顿时让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冲天而起,把北大搞得硝烟弥漫,飞沙走石。陈伯达后悔了,他还想扶正聂元梓这块石碣,镇住“妖魔”。然而,“妖魔”一旦飞升,你怎么能镇得住呢?

第15页:“聂元梓1978年工军宣队进校不久”,这里的1978年应该是1968

年（68年8月19日工军宣队进北大）。“聂元梓因为反……，反张春桥，对江青有二心……”，这里的“反张春桥”事实依据是什么？

5. 陆水林谈郑仲兵的访谈

郑仲兵的口述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需要作专题研究。

第4页：“聂的观点更像谁？”

我觉得谁都不像，就是北大自己的。1966年，北大学生对聂、孙的影响是很少的。进入1967年后，北大学生（特别是动态报的人）反映上来的情况，对聂、孙有很大影响；新北大公社成立后，公社总部在一些问题上处在一线，聂、孙作后盾，有相互影响。由此形成北大自己的路。

第5页：“聂看不起谢富治、吴德”。

其实不是看得起看不起的问题，而是看不过谢和关、戚一伙互相勾结、结党营私的问题。

第5页：“在北京市成立革委会时，新北大公社是什么角色？”

什么角色也不是。新北大公社总部从未与闻北京市成立革委会之事，从未关心此事。4月14日听了孙蓬一的讲话，群情激愤要去找谢富治辩论时，聂赶来阻拦，才知道北京市革委会4月20日就要成立了，此时万万不能反谢。

第6页：陆平一伙把左派逼得在北大不能存身，只能调走。张恩慈去了马列学院，正好进了中央理论小组，由此成了聂与曹之间的牵线人，杨克明实际上也已调走。对大字报起关键作用的两个人，竟然不是北大的人，大字报的产生，岂非天意？

毛泽东是在光明日报的内部简报上看到大字报并在简报上写下批示的，不是谁交给毛的。

第7页：《公安部某负责人讲话》

这个《讲话》把谢的面目暴露无遗，一个公安部长怎么能做得出这样的事情？由此，几十年革命的威信轰然倒塌。我反谢，由此开始。

第7页：东语系那个战斗队似叫“冲锋号”，就一个人，毕业后就去了民院。他夫人是你们物理系的杨玉。

第11页第1行：把调查材料交给邓颖超的应是聂。

第12页：1967年1月以后，中央文革对聂的态度有改变。

这是因为北大干扰了关锋一伙的夺权计划。

第12页：江青的态度有很大变化。

关键是什么时间？孙蓬一4·12讲话一定使江青很被动。孙蓬一4·12讲话后，中央文革各成员都是什么心态？可惜无从了解。关锋一定是大怒，继而大恐，赶紧安排吴传启等人躲起来。他会给江青施加压力吗？对于吴传启一伙，孙蓬一4·12讲话等于敲响了他们的丧钟。对于戚本禹，在帮关锋站台撑腰的同时，他得赶紧安排自己的那条线。

任何别的人讲了孙蓬一那样的话，马上就会被灭了。但孙蓬一是代表北大的，所以能顶住。北大就是北大。

第14页：杨勋是井冈山总部成员吗？

第15页5行：应为1968年。

第15页：聂何时反张春桥？是庐山会议吗？对江青谈得上一心或二心吗？聂就是因为反关锋一伙，得罪了关锋后台。

6. 张晓良为121期纠错

1. 3页正文3行：铁道干校党委副书记樊西曼；4页1行：曹的母亲樊希曼（铁道部干部学校的党委书记）。当是同一人，樊西曼，樊希曼？副书记，书记？网上搜寻，樊西曼（1915—1966）河南省淮阳县人。1936年入党。抗战时期曾任淮南盱眙县委组织部长。1966年8月逝世前任铁道部党校党委副书记。

2. 3页倒数8行：“曹滨海的家里造反。曹你是高级军官”。“曹滨海”的“曹”是“曹”的异体字，如今一般不用，或用于韩国人姓名；“曹你是高级军官”，疑为“曹父是高级军官”。

3. 71—75页：“触目惊心的复辟”，这一篇《记忆》第110期已刊。

6. 张晓良为121期纠错

7. 杨耀健谈红卫兵

贵刊此前及本期刊登的《北师大二附中的红色暴力》等亲历者的回忆文章，使我想到一个问题，红卫兵不仅是无辜的受害者，也是施害者。记忆民族灾难不提及自己的责任，其实是一种集体自我欺骗，一种人为的集体失忆。支配与被支配，受害与加害，顺从与反抗，合作与不合作，依然是当今人们所面临的问题。

《记忆》对“红色年代”民族心灵史的梳理，触动到一块深层次的疮疤，揭开了黑暗年代中最黑暗的盖子，发人深省。

8.小庄谈唐燕之作

唐燕的文章让我深有感触。她几次给王友琴纠错，用心良苦，态度诚恳。无疑是在帮助王友琴，让她把书修改得更完美。可惜王友琴不领这番好意。王友琴应该大方地接受读者提供的纠错信息，对《文革受难者》进行修订。这样不但能保证自己的作品的真实性，还能赢得各方人士的尊重。

9. 涧之溪、秋山枫叶、东方倦客等谈 121 期教育专辑的刊头设计

- 121 期的刊头，不但吸引眼球，而且很有后现代的意味，赞！
- 本期刊头好可爱，喜欢！
- 贵刊的刊头大有改进，从风景转向人文，将图文结合起来，让刊头从自然风光中走出，走进了富有寓意的境界之中，在简洁的构图中，融入了历史内容。希望这种既大饱眼福，又启迪心智的作品多起来！

【版权声明】

版 权 声 明

《记忆》创刊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电子刊物。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并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